当代国际关系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World War II**

**授课教师**沈逸 教授

**助教**张书言（[23210170033@m.fudan.edu.cn](mailto:23210170033@m.fudan.edu.cn)）

**目录**

[第一讲 绪论：后-后冷战时代与新时期国际关系热点解析 6](#_Toc168389869)

[一、“大争之世” 6](#_Toc168389870)

[（一）系统理解当代世界 6](#_Toc168389871)

[（二）正确看待和理解当今世界 7](#_Toc168389872)

[二、从后冷战时代到后后冷战时代 7](#_Toc168389873)

[（一）后冷战时代与后后冷战时代的特征 7](#_Toc168389874)

[（二）美国对后后冷战时代到来的反应 7](#_Toc168389875)

[三、全球热点局势梳理：美国的战略挑战 8](#_Toc168389876)

[（一）俄乌战争：从“最具价值”的投资到“战略性烂尾工程” 8](#_Toc168389877)

[（二）突然升级的巴以冲突：威胁拜登连任的战略危机 8](#_Toc168389878)

[（三）中国方向：阶段性和缓与中国关系成为美国战略首选 9](#_Toc168389879)

[四、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热点的2024展望 9](#_Toc168389880)

[（一）持续深化发展的“债务驱动”型发展模式 9](#_Toc168389881)

[（二）美国的政治衰朽问题持续凸显 9](#_Toc168389882)

[五、中美关系的未来 9](#_Toc168389883)

[六、理解国际关系的知识体系 11](#_Toc168389884)

[（一）总论 11](#_Toc168389885)

[（二）认识和理解国际体系的基本框架 11](#_Toc168389886)

[第二讲 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与全球制度的确立 12](#_Toc168389887)

[一、盟国首脑会议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 12](#_Toc168389888)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进程 13](#_Toc168389889)

[（二）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 13](#_Toc168389890)

[二、雅尔塔会议 14](#_Toc168389891)

[（一）战后秩序地区性安排 14](#_Toc168389892)

[（二）苏联对日作战协定 15](#_Toc168389893)

[（三）联合国问题 16](#_Toc168389894)

[三、全球经济制度的建立 16](#_Toc168389895)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全球经济制度 16](#_Toc168389896)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16](#_Toc168389897)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特征 16](#_Toc168389898)

[四、全球政治制度的建设 17](#_Toc168389899)

[（一）顿巴顿橡树园会议和关于建立联合国的建议 17](#_Toc168389900)

[（二）旧金山会议和联合国的正式建立 17](#_Toc168389901)

[（三）联合国机构 17](#_Toc168389902)

[第三讲 战后初期盟国的合作与美苏冷战的爆发 18](#_Toc168389903)

[一、战后初期盟国的合作 18](#_Toc168389904)

[（一）波茨坦会议 18](#_Toc168389905)

[（二）仆从国问题的解决 18](#_Toc168389906)

[二、美苏矛盾的迅速发展 19](#_Toc168389907)

[（一）美苏战略目标的冲突 19](#_Toc168389908)

[（二）雅尔塔体系的内生缺陷 19](#_Toc168389909)

[（三）东欧问题的争执 19](#_Toc168389910)

[（四）战后初期美苏矛盾的激化 20](#_Toc168389911)

[三、遏制战略的酝酿与杜鲁门主义的提出 20](#_Toc168389912)

[（一）遏制战略的酝酿 20](#_Toc168389913)

[（二）杜鲁门主义 21](#_Toc168389914)

[（三）凯南对遏制战略的进一步阐述 21](#_Toc168389915)

[第四讲 两大阵营的形成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初步胜利 22](#_Toc168389916)

[一、两大阵营的形成 22](#_Toc168389917)

[（一）大西洋联盟的形成 22](#_Toc168389918)

[（二）东方阵营的初步形成 24](#_Toc168389919)

[二、柏林危机和两个德国的出现 24](#_Toc168389920)

[（一）第一次柏林危机 24](#_Toc168389921)

[（二）德国分裂的加深 25](#_Toc168389922)

[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初步胜利 26](#_Toc168389923)

[（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26](#_Toc168389924)

[（二）西方国家的对策 26](#_Toc168389925)

[（三）殖民体系在亚洲的最初崩溃 26](#_Toc168389926)

[第五讲 两大阵营的激烈对抗与中立主义运动 26](#_Toc168389927)

[一、东西方在亚洲的对抗 26](#_Toc168389928)

[（一）东方阵营向亚洲的扩展 27](#_Toc168389929)

[（二）朝鲜战争 27](#_Toc168389930)

[（三）越南抗法战争 27](#_Toc168389931)

[（四）美国构建西太平洋同盟体系 28](#_Toc168389932)

[二、东西方在欧洲的对抗 28](#_Toc168389933)

[（一）舒曼计划和普利文计划 28](#_Toc168389934)

[（二）巴黎协定与北约的扩大 28](#_Toc168389935)

[（三）华约的缔结 29](#_Toc168389936)

[三、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加强 29](#_Toc168389937)

[第六讲 美苏关系的第一次缓和与两个阵营的动荡 29](#_Toc168389938)

[一、美苏关系的第一次缓和 29](#_Toc168389939)

[（一）苏共二十大及外交政策调整 29](#_Toc168389940)

[（二）美国对外战略的改变 30](#_Toc168389941)

[（三）东西方关系的解冻与缓和 30](#_Toc168389942)

[（四）第二次柏林危机与第一次缓和的受挫 31](#_Toc168389943)

[二、两大阵营的内部动荡 32](#_Toc168389944)

[（一）东方阵营内部的矛盾 32](#_Toc168389945)

[（二）西方阵营的变化 33](#_Toc168389946)

[三、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阶段 33](#_Toc168389947)

[第七讲 美苏关系的再度紧张与两大阵营内部冲突的发展 33](#_Toc168389948)

[一、古巴导弹危机 33](#_Toc168389949)

[（一）肯尼迪政府与美国战略转型 33](#_Toc168389950)

[（二）第三次柏林危机与柏林墙 34](#_Toc168389951)

[（三）古巴导弹危机始末 34](#_Toc168389952)

[（四）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的僵持 35](#_Toc168389953)

[二、东方阵营的部分解体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36](#_Toc168389954)

[（一）中苏分歧的产生与同盟破裂 36](#_Toc168389955)

[（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36](#_Toc168389956)

[三、西方阵营内部矛盾加深 38](#_Toc168389957)

[（一）肯尼迪多边核力量计划及其破产 38](#_Toc168389958)

[（二）法国退出北约一体化机构 38](#_Toc168389959)

[（三）欧洲内部矛盾加剧 38](#_Toc168389960)

[四、第三世界的兴起和反美斗争 39](#_Toc168389961)

[（一）不结盟运动的形成 39](#_Toc168389962)

[（二）77国集团的形成 39](#_Toc168389963)

[（三）印支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40](#_Toc168389964)

[第八讲 美苏关系的第二次缓和与争霸以及第三世界的反霸斗争 40](#_Toc168389965)

[一、中美关系的历史发展 40](#_Toc168389966)

[（一）新中国建立前后的中美关系 40](#_Toc168389967)

[（二）台湾问题 41](#_Toc168389968)

[（三）中美关系的转变 43](#_Toc168389969)

[二、美苏对外战略的新调整 43](#_Toc168389970)

[（一）尼克松政府的对外战略调整 43](#_Toc168389971)

[（二）苏联战略的调整 43](#_Toc168389972)

[三、美苏军控谈判 44](#_Toc168389973)

[（一）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 44](#_Toc168389974)

[（二）欧洲安全 44](#_Toc168389975)

[（三）第二次缓和的终结 44](#_Toc168389976)

[四、世界其他地区局势的变化 45](#_Toc168389977)

[第九讲 美苏关系的再度紧张与第三次缓和 45](#_Toc168389978)

[一、美苏关系再度紧张 45](#_Toc168389979)

[（一）里根“重振国威”和美苏僵硬对抗 45](#_Toc168389980)

[（二）美国和苏联在热点地区的争夺 45](#_Toc168389981)

[二、美苏关系的第三次缓和 45](#_Toc168389982)

[（一）苏联战略的调整 46](#_Toc168389983)

[（二）第三次缓和的促成 46](#_Toc168389984)

[三、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增强 46](#_Toc168389985)

[（一）国际关系中的新因素 46](#_Toc168389986)

[（二）中国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地位的提升 46](#_Toc168389987)

[（三）西欧联合运动全面加强以及日本积极谋求独立发挥作用 46](#_Toc168389988)

[第十讲 苏联的动荡、东欧的剧变与冷战的结束 47](#_Toc168389989)

[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陷入困境，以及最终导向苏联的解体 47](#_Toc168389990)

[（一）戈尔巴乔夫改革 47](#_Toc168389991)

[（二）叶利钦反对派 48](#_Toc168389992)

[（三）苏联解体 49](#_Toc168389993)

[二、东欧剧变 50](#_Toc168389994)

[（一）东欧各国的剧变 50](#_Toc168389995)

[（二）柏林墙的倒塌和德国的统一 50](#_Toc168389996)

[第十一讲 美国构建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努力 51](#_Toc168389997)

[一、美国关于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构想 51](#_Toc168389998)

[（一）“世界新秩序” 51](#_Toc168389999)

[（二）克林顿政府的参与（engagement）和扩展（enlargement）战略 52](#_Toc168390000)

[（三）北约的扩张 52](#_Toc168390001)

[二、“超越遏制”与美俄短暂的蜜月期 52](#_Toc168390002)

[（一）超越遏制战略 53](#_Toc168390003)

[（二）布什政府对原苏联-独联体-俄罗斯的战略调整 53](#_Toc168390004)

[三、海湾战争 54](#_Toc168390005)

[第十二讲 美国构建“世界新秩序”努力面临的挑战 54](#_Toc168390006)

[一、美俄关系的变化 54](#_Toc168390007)

[（一）美俄蜜月期的结束 54](#_Toc168390008)

[（二）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 54](#_Toc168390009)

[二、南斯拉夫内战 55](#_Toc168390010)

[（一）南斯拉夫解体 55](#_Toc168390011)

[（二）波黑战争与科索沃战争 55](#_Toc168390012)

[三、在第三世界地区遇到的挑战 55](#_Toc168390013)

[（一）非洲与拉丁美洲的挑战 55](#_Toc168390014)

[（二）亚洲的核问题 55](#_Toc168390015)

[第十三讲 欧洲和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 56](#_Toc168390016)

[一、欧盟与欧洲的发展 56](#_Toc168390017)

[（一）欧盟的建立与初步发展 56](#_Toc168390018)

[（二）欧盟的扩大与《阿姆斯特丹条约》 57](#_Toc168390019)

[二、东盟与东亚地区主义 57](#_Toc168390020)

[（一）东盟的发展 57](#_Toc168390021)

[（二）东盟地区论坛与“10+3”对话机制的建立 57](#_Toc168390022)

[第十四讲 9·11恐怖袭击与布什主义 57](#_Toc168390023)

[一、9·11恐怖主义袭击及其影响 57](#_Toc168390024)

[（一）9·11恐怖主义袭击 57](#_Toc168390025)

[（二）布什主义 58](#_Toc168390026)

[二、“先发制人”与伊拉克战争 58](#_Toc168390027)

[第十五讲 多极化深入发展的世界 59](#_Toc168390028)

[一、普京与俄罗斯的重新崛起 59](#_Toc168390029)

[（一）俄罗斯经济的复兴 59](#_Toc168390030)

[（二）军事力量的加强 59](#_Toc168390031)

[（三）对外政策与俄罗斯对外关系的发展 59](#_Toc168390032)

[二、欧盟与日本的发展 59](#_Toc168390033)

[（一）欧盟的进一步发展 59](#_Toc168390034)

[（二）日本的政治抱负与右倾化 60](#_Toc168390035)

[三、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增长和合作团结的加强 60](#_Toc168390036)

[（一）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的增长和“金砖国家” 60](#_Toc168390037)

[（二）跨洲性的发展中国家组织的发展 60](#_Toc168390038)

[（三）地区合作组织的加强和一体化的发展 60](#_Toc168390039)

[四、联合国作用的加强 61](#_Toc168390040)

[第十六讲 结论：后-后冷战时期的大国战略博弈与国家安全新态势 61](#_Toc168390041)

[一、走向“大争之世”的世界 61](#_Toc168390042)

[（一）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与世界经济 61](#_Toc168390043)

[（二）1600~2023年国际体系的演变 62](#_Toc168390044)

第一讲 绪论：后-后冷战时代与新时期国际关系热点解析

2024.2.27 / 2024.3.5

一、“大争之世”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即将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中止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制造了台湾问题。这就是以实力为准绳的国际关系。当代国际关系正在发生变化，那么是加速这种变化，还是减慢这种变化？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GDP不断增加，但GDP的全球占比不断下降，可见其绝对实力虽然在持续增长，但相对实力已大不如前。那么，哪个行为体挤占了美国本来的GDP比重，这个行为体就是美国的战略对手。显然，这个行为体就是中国。从经济上来讲，中国和美国确实形成了一种“两极格局”。

在两个主体之间出现挑战时，存在一种政治手段即“解构”，其作用之一就是将挑战重新定义为非挑战。

二战之后，美国极力推行“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这是一种现实主义提倡的国际关系非道德化，即国际关系中并没有私人之间伦理道德的关系。

（一）系统理解当代世界

1. 中国的发展与当代世界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借口是中国阻拦自由贸易；当代，中国宣称要成为自由贸易的捍卫者。1950年，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对手是联合国军；当代，中国认为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这意味着，当代国际关系的变化正在加速，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急速变化，从“中国寻求国际社会的接纳和认可”转变为了“中国就是国际社会的一员”，从“遵守国际规则”转变为了“缔造新的国际规则”。

中国并不寻求改变现有的国际体系，意味着中国仍然尊重“主权平等”“民族自决”等原则，但更注重确保这些原则正确地落实。这些规则不仅是规则，更是要将规则变为具体的为了世界福利的解决方案。此外，要在这一过程中避免自身成为霸权主义国家。

2. 国际体系正经历深刻调整与变化

当代的国际体系有以下特征：

* 中美两国力量对比更趋平衡，以实力分布衡量的国际体系经历深刻调整；
* 大国战略博弈的核心聚焦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实践，前任领导者基于极端自我中心主义向麻烦制造者转移成为主要挑战；
* 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以此从存量竞争转变为对生产力的解放；
* 社交媒体高速发展日趋凸显全球资本主义内生结构性矛盾，“民粹主义”标签下的“右倾”趋势显著，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均面临“阶级-阶层政治”回归的挑战。《推特治国》一书指出，在冷战之后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阶段，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差距不只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差距，更是资产阶级内部的差距，如当代美国的数字金融寡头。在这一背景下，以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共和党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政党选择了“拥抱财阀”，并利用着政治煽动的手段获取各个阶层的选票；
* 全球范围内西方国家与人口、族裔分界线重合的财富分界线引发群体性恐慌和焦虑。霸权国家一方面对外开支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服务），另一方面承受着国内对国家财政用于对外而不用于对内的质疑。因此，相当一部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选择了“内向化”，例如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共和党；
* 西方发达国家内贫富分化显著，阶层分野凸显程序性票选民主政治制度安排的内生矛盾，加剧国内政治极化的同时，增加了向新兴大国转嫁国内矛盾的冲动；
* 全球治理赤字显著。

自特朗普时期起，逆全球化浪潮迭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较少提及“全球化”了；然而，考虑到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中国就要特别地提倡全球化，缔造全国统一大市场，再从全国统一大市场迈向全球统一大市场，把边界对资本、信息、人等要素的限制降到最低。

（二）正确看待和理解当今世界

2018年，习近平提出认识和理解世界大势需要正确的“三观”，即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

历史观方面，要把握关键细节，获取准确认识，不要被刻板印象局限；大局观方面，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生产力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角色观方面，要站稳立场，用符合立场的框架来看待和解释世界。

掌握当代国际关系有三个重要步骤：

* **了解基础事实：**善于查找利用原始档案，且能读懂档案中潜在的言外之意；
* **理解基本规律：**需要从历史中总结出理论性的解释，关注总体而非局部；
* **思考总体趋势：**思考并预测发展的方向，基于事实给出合理的预测。

二、从后冷战时代到后后冷战时代

（一）后冷战时代与后后冷战时代的特征

后冷战时代的开启的标志是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一超”，“历史终结”成为可能；后冷战时代结束的标志则是中国复兴、美国回应、“历史终结”的终结。

后冷战时代的核心特征是西方主导下的超级全球化。体现在政治经济影响力的西方独大，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西方主导，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全球治理的西方主导。

后后冷战时代的核心特征是西方的相对衰退与非西方的群体崛起。体现在西方国家普遍遭遇国内民粹主义的冲击与挑战，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的中国贡献，全球经济议题与全球治理的“东西方逆转”（西方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逆潮流者，“泛安全化”名义下的心因性保护主义全面崛起；非西方世界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驱动者）。

教授认为，民粹主义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在当代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下被允许的体现形式。

（二）美国对后后冷战时代到来的反应

拜登政府的总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了——美国霸权的心理-认知优势与实力边界呈现显著张力；美国无法摆脱挑战者，无法战胜挑战者，无法不依靠挑战者——合作解决全球治理面临的各项挑战成为首要选择。

2024年，美国国务卿沙利文在美国外交事务协会（CFR）上的演讲指出：

* 美国过去数十年用各种方式改变中国的努力已经失败；
* 美国需要一套新的对华战略，但现任政府还没有这样一套战略，只是有了新的做法：
  + 不像特朗普那么极端，以至于面临和中国全面冲突的风险；
  + 不像过去那么乐观，认为美国可以影响和改变中国；
  + 美国需要做三件事情：
    - 投资美国自己，提升美国实力（间接承认美国发展模式出了问题）；
    - 改善联盟关系（让盟友为美国拖延时间）；
    - 与中国竞争（稳住中国，精准制约，拖延时间，能拖多久是多久）。

三、全球热点局势梳理：美国的战略挑战

（一）俄乌战争：从“最具价值”的投资到“战略性烂尾工程”

在俄乌战争中，美国可支配的资源消耗快于预期；乌克兰战场局势俄罗斯占优，俄罗斯持续反攻；随着战争持久化、消耗化，西方国家国内政治普遍倦怠；乌克兰内部出现危机。

2021年，拜登与普京在瑞士有过一次会面。据信，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希望拜登仿照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政府“联中抗苏”的策略。然而，对这一历史关头，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2021年的俄美关系，其中的最关键的阻碍因素即是俄罗斯于2014年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为此，若要缓和俄美关系，美国就需要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合法；但是，这样做相当于放弃了对“新欧洲”的安全保障承诺，进而相当于放弃了在欧洲的霸权。这与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目的是不符的。

（二）突然升级的巴以冲突：威胁拜登连任的战略危机

美国曾有“2.5场战争（两场战区级战争——二战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一场局部战争——朝鲜战争）”“1.5场战争”等说法，其中的“1”就是美国亲自参与的一场战区级战争。然而，当今的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中，美国均未直接下场，无法投入决定性军事力量。这体现出当代美国与冷战时期美国截然不同的战略能力。

巴以冲突暴露出的问题包括：

* 美国以国内政治为导向的中东斡旋意外触发危机；
* 以色列国内政治危机耦合地缘政治风险，“协同共振”促成危机“失控”；
* 以色列军队战力羸弱，进展不顺，社交媒体大幅度削弱西方亲以色列媒体塑造的认知茧房，美国面临“犹太绞索”的意外威胁；
* 巴以危机外溢到红海危机，胡赛武装测试美国军力边界；
* 伊朗以及“中东反抗之弧”加剧行动，美国面临三难选择：
  + 在中东实质性增兵，大概率复制伊拉克、阿富汗经历，且干扰对中国战略竞争；
  + 放任以色列单独承受压力，在国内精英阶层面临亲以色列力量压制；
  + 无条件偏袒以色列，拜登政府面临失去2024年总统选举的直接风险。

（三）中国方向：阶段性和缓与中国关系成为美国战略首选

**美国感觉到了对中国的需要，在2024年总统选举的现阶段尤其如此：**美国必须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美国必须依靠中国提供必要支撑，或者至少不要在俄罗斯、中东两个方向上公开直接与美国“打擂台”；美国政府需要在禁毒、人工智能、国家安全三个维度展示拜登政府执政成绩，必修得到中国政府合作（比如需要中国配合接听美国热线电话）。

**美国寻求稳定台海局势，管控可能的激进台独举动：**旧金山峰会中美事实上就管控激进台独达成了首脑级的默契；美国采取了一定的行动，直接规训岛内激进台独力量；国内政治成为主要的干扰因素来源。

四、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热点的2024展望

（一）持续深化发展的“债务驱动”型发展模式

政府要增加财政收入，主要是通过税收和借债。美国民主党目前既需要维护福利发放的数额，对富人征税的进程又在国会中寸步难行，因此其发展就必须由债务驱动。**高息-高股价的金融发展模式与美国政治模式深度绑定**，选举政治决定了美国不可能压制金融部门的发展，实现结构性产业调整。

**象征性的产业回流与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于竞争性选举政治。**制造业增长由高科技产业新开工基础设施增加值驱动，但台积电和三星的建设均遭遇结构性制约；美国的制造业增长主要依靠制造业基建而非制造业本身，1.2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大型的“以工代赈”；芯片与科技法案在运行中转型为“就业创造”与“社区振兴”的混合-公益型法案。

**美国基层民众的“缺乏获得感”加剧而非减弱**，民粹主义土壤进一步强化而非减弱。

（二）美国的政治衰朽问题持续凸显

**缺乏务实有效的治理能力。**可以看到问题，给出方案，调集资源，但不能解决问题；缺乏有效的产业政策；本土产业链的重构，以及全球产业链调整，在实践中转化为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心理脱钩”实践。

**两党政治撕裂与极化**，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成为“两党三方”的竞选。

**具有社会实质性影响的事件持续且普遍“政治化”**，如移民问题与得州边境危机。就2023年而言，中国向美国的非法移民数量剧增，显示了美国边境移民管控的问题。

五、中美关系的未来

中美关系现阶段的主要特点有：

1. 传统的深层结构性矛盾逐渐浮现，约束条件下的战略竞争与务实合作成为客观趋势。
   1. 中美实力变化的总体态势没有发生变化；到2049年，中国的GDP可能是美国的1.5倍、2倍，甚至2.5倍；
   2. 美国国内政治结构与认知壁垒损害中美战略稳定，对冲和抵消中国维护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能力；政治结构方面，西式民主的对抗式政治使得在野党必须在执政党做得欠佳的地方超过之，但这反而可能出现“为了反对而反对”的现象；认知壁垒方面，美国官方在不触及意识形态的话题上比较自由，但在触及意识形态尤其是触及共产主义时就高度敏感，“与共产党合作”成为了抨击与中国合作的策略的利刃；
   3. 中美力量差距全面但非对称-非均衡的缩小，中国在科技的各个方面与美国的差距有的已经较小或超过，有的正在缩小，而有的仍较大，在中国强大经济实力的助推下，可想力量差距的缩小；中美战略力量的稳定约束机制，从“最小限度核威慑+阶段性共同战略需求”，向“有限核威慑+非对称常规力量威慑+嵌套的经济-金融依存+议题性共同治理需求”转化，转化期导致中短期的动荡；
      1. **有限核威慑：**中国之所以不参与核武裁减，就在于中国因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而所需的二次打击能力要求巨大的核武量级，中美核武量级仍有一定差距，因此中国必须保证足够的核武量级用于威慑；早在奥巴马时期，基辛格就提出要“建设没有核武器的世界”，这是因为美国具有当今世上最强大的常规力量，然而当美国希望使用常规力量对某些国家采取行动时，那些国家若有核武器就可以予以威慑，使得美国常规力量的优势被抵消；
      2. **非对称常规力量威慑：**中美常规力量之间也仍有差距，当前中国培养常规力量的主要目的是突破所谓“第一岛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台湾问题；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实际上具有一定默契，即排除使用武力，保持威慑，因而要排除（至少是明显的）“台独”；
      3. **嵌套的经济-金融依存：**目前看来，中美互利的一个优秀做法是：美国的科技研究成果与中国的制造相配套，利用美国的金融市场优势和中国的实体经济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合作赚取利润，并在双方间合理分配；然而，由于前述原因，以及美国对抗性政治使得其缺乏产业政策土壤的客观条件，美国官方很难长期接受这一模式。
   4. 能够维持有效发展势头和发展动能的一方，将在长期的持续性的战略竞争中取得主动；
   5. 约束条件下战略竞争持续展开的同时，务实合作仍然存在空间与可能。目前所谓的“中美脱钩”，往往只是第三方中转贸易的体现，因此只是一种“心理脱钩”。
2. 系统性的战略博弈能力建设成为新时期中方的主要战略任务。实力对比推动中美关系进入“以反制促稳定”的新阶段；中美关系面临战略波动的主要问题是美国的战略错觉，校正这种错觉的主要方式是中方构建有效的反制能力。
3. 中美之间的复合相互依存机制逐渐趋于深化。构建有效的“工具化”以及必要的“武器化”能力，将成为中美关系新的战略压舱石。新时期中美战略压舱石的本质是一种认知塑造的过程：与中国合作，美国有利可图；与中国对抗，美国会遭受不可承受的损失；美国并不具备可以随意损害中国国家利益，而不用遭受来自中国报复和反击的特殊地位；中美之间存在差距和差异，但中美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和对称的。
4. 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之一是政府治理能力。中国具备政府治理能力的比较优势，尤其是在产业布局和推动经济发展领域；要克服错误认知，即中国政府能够做到的事情，美国政府可以简单复制，因为即使美国政府希望推行某种政策，这种政策也可能被游说集团阻止。
5. 美国实力的边界和能力的有限性正在逐渐凸显。经济和产业发展有内生规律，“政治化”和“安全化”的扭曲，将面临显著的制约和反弹。美国产业的转移是多因素作用下的客观历史进程，简单的补贴与税收减免，以及对外制裁，会造成供应链扰动，但无法促成产业回归，相反会加速美国失去对产业战略节点的有效控制。美国在本国的生产线往往不及在中国的生产线的效率，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畸形的工会制度。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
6. 推动中美关系在新实力对比下进入新的稳健发展轨道会成为“实践性共识”。

六、理解国际关系的知识体系

（一）总论

1. 政策、理论和历史三位一体

**政策、理论和历史三位一体。**政策、理论和历史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他们三位一体，密不可分。

* 历史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提供基本事实、演进路径、客观参照；
* 理论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揭示了本质、规律和机制；
* 政策回答“怎么办”的问题，即如何在成本可控的情况下找到具体方法。

**历史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任何严肃的国际关系研究都必须通过对历史的观察进行政策思考和理论升华。

历史、理论与政策应综合运用。以美朝关系为例：历史是1950年至今的美朝关系；理论包括同盟理论、局部战争、安全困境、博弈论等；政策是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前景，以及美朝关系的发展趋势与影响。

历史、理论与政策之间有互动作用。作为锚点的历史防止了基于纯粹概念和想象条件的思辨游戏，直接或间接检验理论或者政策的可靠性；作为方法的理论促使对事实的认识是全面的，避免被部分材料所误导；政策则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输出有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2. 理论的本质和功能

理论是一种符号结构，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假设。理论提出一系列具体说明各种变量之间关系的命题或假设，依此系统地阐述关于各种现象的观点，从而对这些现象作出解释或预测。理论的效力并不一定依赖经验证明，只需要逻辑地演绎出理论所研究的现象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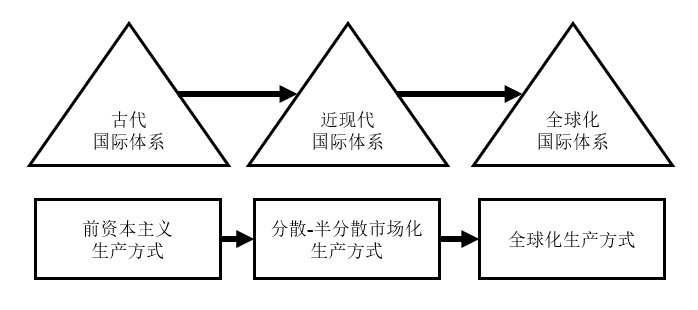
理论为实践提供演绎推理、经验知识和价值判断（产生于历史事实的积累，这些历史事实影响人的情感和直觉）。

理论家和决策者的区别在于：

* 纯粹的理论家往往力求通过演绎思维过程推导出概括性的结论
* 政策制定者则力求通过个人的亲身实践总结经验性的和归纳性的认识，而不是靠系统的研究
* 社会理论家希望集中研究许多形势共有的一般性规律
* 政策制定者关注的是特定形式中每一个具体情况下的政治价值力量和偏好的微妙细节，而不是关心能否验证一个一般性的抽象概念或概率推测；决策者始终要了解仅余亟待处理的问题有关的那些方面的全部详细情况。

理论的功能包括描述、预测和建议。理论的研究方法包括逻辑分析、传统观察和定量分析。

（二）认识和理解国际体系的基本框架



国际关系历史的断代一般分为古代国际关系、近/现代国际关系和当代国际关系。国际关系体系的历史演进一般分为古代国家体系和近代国家体系。

1. 古代国际体系

在欧洲，古代指中世纪之前的历史；在其他地区，古代指被现代化浪潮席卷之前的历史，具体时间上因地而异。

古代国际体系具有分散性，以地区性体系为主，以文明为主要体系特征，体系之间的交往不发达，战争和征服是主要的交往方式。

古代国际体系的演变主要表现为一种循环逻辑，从独立国家体系（independent state system）发展到霸权国家体系（hegemonic state system） ，再发展到帝国体系（empire or suzerain system），帝国衰落后又进入独立国家体系，并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2. 欧洲中世纪封建体系

欧洲中世纪封建体系的特点是一大群大小不等的政治单位都声称拥有权力；神圣罗马帝国（the Holy Roman Empire）声称拥有世俗领域的普遍管辖权，而罗马教皇则声称在精神领域有普遍的管辖权，它们两者之间经常会发生权力之争；公共权威个人化；政治版图经常随王朝联姻而变动。

3. 近现代国际体系

1618~1648三十年战争之后，领土国家成为欧洲主要政治单位。主权观念确立；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现代国家不仅存在于政治、外交和军事领域，也存在于经济领域。

在随后的历史演进中，随时间形成了四个主要国际体系：

* **韦斯特伐利亚体系：**三十年战争与韦斯特伐利亚和会；
* **维也纳体系：**拿破仑战争与维也纳和会；
*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凡尔赛-华盛顿会议；
* **两极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雅尔塔会议。

第二讲 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与全球制度的确立

2024.3.5 / 2024.3.12

一、盟国首脑会议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

美国总统罗斯福积极推动了战后世界秩序的建立进程，基本的目标不仅是加强大国的战时合作，而且还包括构建相对均衡考虑各方利益的战后世界新秩序。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进程

1. 1944年起两条战线走向胜利

欧洲战线从1944年开始，盟军实现了战略反攻。1944年，苏联对德军发起战略反攻；1944年上半年，美英军队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1945年，盟军两线夹击德国：4月25日，易北河会师；4月30日，希特勒自杀；5月7日，德国宣布投降。挑起战争的军事冒险最终让德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亚太战线从1944年开始，盟军开始更大规模的反攻。1944年，夺取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突破所谓日军绝对防卫圈；1945年，攻占小笠原群岛和琉球群岛；1945年8月，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1944年，中国对日开始战略反攻；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本宣战；1945年8月10日，日本声称愿意在“不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的情况下接受波茨坦公告，未能获得对此条件的正式接受；8月14日，根据天皇本人的裁断，日本政府宣布投降。

2. 二次世界大战揭示的基本原理

1. 军国主义的道路没有前途。1929-1933年经济危机和萧条后，德国和日本的尝试反复说明了这一点。
2. 国家的发展主要不能依靠军事征服。即使短期曾经取得成功的德国和日本，也无法长期依靠军事征服实现自身实力的可持续发展，最终趋于失败。
3. 和平与发展需要有充分的实力才能保障。和平的环境以及发展的机会，不是靠祈求与施舍，拥有充分的实力，才具备保障和平发展的资格。

（二）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

1. 开罗会议

1943年10月，莫斯科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决定11月底在德黑兰举行首脑会议。罗斯福希望和中国进行磋商，丘吉尔也希望赴德黑兰之前与罗斯福统一立场。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埃及首都开罗进行了开罗会议。

开罗会议的主要成果是《开罗宣言》。其中提到，三大盟国战争的目的在于“制止日本及惩罚日本之侵略”，“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一切岛屿”，“使日本所窃取至中国之领土，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并使“朝鲜自由独立”。此外，还要求蒋介石同意将大连港辟为自由港，以此交换斯大林参加对日作战的许诺，蒋介石同意考虑这一建议。

2. 德黑兰会议

德黑兰会议主要处理了三个问题。

**战败国处置问题。**担心德国再次变成欧洲的战争策源地，因此赞成对德国实行肢解。至于具体的做法，决定由三国外长组成的欧洲咨询委员会加以研究解决。斯大林建议，盟国应该在德国境内和周围控制一系列战略据点，以对德国进行监视。这一主张得到了罗斯福的赞同。这意味着苏联不仅要求了对德国本身的控制，更要求了对德国邻国的控制，体现了苏联尽管对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对外却实行着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这与新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是不同的，也为日后中苏决裂埋下伏笔。

**波兰边界问题。**苏联主张波兰西部以奥德河为边界，东部则应以1939年边界（即苏联吞并波兰东部后的边界）为准，从而确保苏联可以继续保有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西部；同时还要求将东普鲁士北部领土的一部分（包括在波罗的海的不冻港）割让给苏联。英国原则上同意将波兰的疆界西移，谋求以此交换苏联对英国在巴尔干传统利益以及（亲欧美的）波兰流亡政府的承认，但认为东部边界应该是寇松线。美国没有参加讨论，也没有表示异议。

**未来的国际组织（联合国）问题。**新成立国际组织的基本架构包括：大约35个同盟国家构成的大会，定期举行讨论；实施大会提出的建议的执行委员会，成员除了美、苏、英、中之外，还包括一些来自欧洲、拉美、远东以及英国自治领的国家；美、苏、英、中构成的“四警察”机构，“有权立即处理对和平的任何威胁，以及需要这种行动的任何突然事变”。

二、雅尔塔会议

雅尔塔会议是二次大战期间最为重要的国际会议，奠定了“雅尔塔体制”最重要的基石。1945年2月4日~11日，雅尔塔会议在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太阳宫举办。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均参加了此次会议。

雅尔塔会议的主要问题包括彻底击溃轴心国的问题，以及战后世界秩序安排（全球性安排、地区性安排[欧洲、东亚]）。

（一）战后秩序地区性安排

1. 巴尔干问题

英国和苏联更加偏好传统的势力范围分割方式。英国提供了“餐巾纸方案”，即和苏联在东欧-巴尔干进行势力划分，希望英国留下波兰流亡政府，而苏联控制波兰临时政府。然而，苏联提倡在战争结束后，哪国解放的领土就由哪国在这块领土上重建与之制度相同的国家，故“餐巾纸方案”宣告失败。

罗斯福提议通过《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帮助从纳粹德国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以及前轴心国附庸国人民。他提出“用民主方式解决他们迫切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抉择他们生活所寄的政府的形式”。

2. 波兰问题

边界问题方面：

* **苏联：**东部边界以寇松线为界（在若干地区对波兰做5-8公里的逸出），西部疆界应经斯德丁（属波兰）向南先沿奥德河再向沿尼斯河为界。
* **美国：**波兰东部的利沃夫及其附近油田仍然划归波兰；反对以西尼斯河划分波兰西南部边界，继续以奥德河为界。

会议讨论结果是，按照斯大林要求确定了波兰东部边界，但波兰的西部疆界问题留待和会解决。

政权组成问题方面：

* **苏联：**要求正式承认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及其组建的波兰临时政府。
* **英美：**更加偏好在英国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但无能为力，因为波兰是被苏军解放的。于是提出替代方案——组建一个更具代表性的新的临时政府（要有亲英美的代表），并尽早进行“自由选举”。然而，英美却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苏联红军持续驻扎在波兰，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选举出亲英美的政府的。

最后，三巨头达成协议：正在履行职能的临时政府应实行改组，“成立波兰全国统一临时政府”；尽速“根据普遍选举与秘密投票方式举行自由的、不受限制的选举”；美英苏都应与新的“波兰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3. 德国问题

德国问题主要包括基本处置原则和赔偿问题。

基本处置原则方面，三巨头再次肯定了分割德国的原则，但不再进行过细的“肢解”。作为第一步，“在德国武装抵抗最终被击溃后”，三国军队（法国如果愿意也可参加）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同时“成立一个中央管制委员会执行互相协调管理控制的工作”。

战争赔偿问题上则发生了分歧。苏联认为，应采用拆除德国工厂设备、利用德国劳动力以及收取实物等形式，促使德国在十年中向战胜国赔偿200亿美元，其中一半应该给予苏联（定总额，定比例）；英美不反对比例，但不愿意明确总额。各方已经出现了分歧，英美很清楚的意识到如果要遏制苏联的过度扩张，就必须扶持德国。

4. 东亚问题

美国主张“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国”的政策，力图构建一个包括美、英、苏、中的四国神圣同盟，以防止日本东山再起，并增加抗衡苏联的力量。争取苏联尽快参加对日作战以及取得合作，又随时准备以中国的主权以满足苏联的要求。

苏联主张收回俄罗斯在1904~1905日俄战争中失去的领土，竭力扩大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势力和影响。

（二）苏联对日作战协定

苏联承诺，在德国投降以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是：

* 外蒙古的现状予以维持；
* 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恢复；
  + 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交还苏联；
  + 大连商港须国际化，保证苏联在该港的优先权益；
  + 租用旅顺作为海军基地的利益也必须加以恢复；
  + 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由一苏中合办的公司共同经营；
  + 千岛群岛交给苏联。
* 根据斯大林建议，美国总统将设法取得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上述有关外蒙古及中国东北的港口铁路的协议的支持。

可见，苏联在这些要求上依然是一派帝国主义的作风。但苏联并不愿亲自下场与中国接洽，且客观上存在影响力有限，因而通过美国影响了中国。国民党政府之后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全民公决”的方式给出了蒙古，条件是苏联不再给予中国共产党以援助。

（三）联合国问题

雅尔塔会议解决了顿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没有解决的有关联合国的分歧，并决定，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家会议，讨论计划建立的国际组织的宪章。

三、全球经济制度的建立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全球经济制度

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客观需求是：

*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出现的大萧条，在缺乏有效机制协调解决的情况下，最终催生了二次世界大战。因此人们希望能够避免这种情况再度发生；
* 美国根据《租借法》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经济上的高速发展，为美国在金融、投资、贸易三个方面实现全球扩张奠定了基础；
*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现了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实质性拓展和提升，奠定了实施更加积极的世界战略的雄心壮志；
* 传统欧洲国家的大幅度衰退，以及苏联的高速崛起，客观上形成了要有新的更强有力的西方阵营领导者的客观态势。

综上所述，构建一个围绕美国的工业和黄金旋转的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时机已然成熟。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饭店召开了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史称布雷顿森林会议。44个同盟国的代表参加，但主要内容在美国、英国、苏联三方代表于会场外的谈判中加以解决。

此次会议的主要成果包括《最后议定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等文件，并且共同组建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特征

**双挂钩。**即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黄金维持官价1盎司=35美元，进行无限量兑换，此为美联储的义务。其他国家维持本国货币对美元的稳定汇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本总额88亿美元，由各会员国按照规定份额认缴，份额决定投票权。可用本国货币向基金申请外币，以应付临时性的国际收支逆差。各会员国货币的官价，要以一定数量的纯金或者根据美元表示，非经美国政府同意不得改变。

作为以上两点的结果，各国政府承担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美国政府承担美元为可兑换货币的义务，美元获得了高于其他货币的中心和支柱的地位，但美国也在国际贸易中长期保持赤字（贸易逆差）以保证美元可以流通出去。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法定资本为100亿美元，各国认缴。表决权由认缴份额决定。其主要业务包括帮助各会员国（或地区）从私人银行获得长期贷款，以及直接向会员国（或地区）提供贷款。美国掌握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

四、全球政治制度的建设

（一）顿巴顿橡树园会议和关于建立联合国的建议

罗斯福的构想是组建一个以少数大国为核心的单一的、普遍的国际组织。1944年7月，《普遍国际组织暂定草案》出台，进行非正式讨论。苏联以未参加对日作战为理由，反对与中国一起参加会谈

1944年8月下旬至9月底，举办了顿巴顿橡树园会议。会议的主要成果包括：

* 新国际组织的基本构成四要素：全体大会、安全理事会、秘书处和国际法庭；
* 安理会权限，以及否决权机制；
* 大会重要决议可以与会会员国三分之二多数票表决通过。

会议签署了《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案》。

（二）旧金山会议和联合国的正式建立

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旧金山会议。50个国家的283名正式代表参加。6月25日，通过《联合国宪章》，以及作为宪章一部分的《国际法院规约》。

联合国的主要使命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国际合作。联合国的主要宗旨是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领土完整和不干涉他国内政。

1945年10月24日，在美、苏、中、英、法五大国和其他24个签字国完成了批准手续并向美国交存了批准书后，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联合国成为国际政治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织。

（三）联合国机构

联合国的六大机构是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与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目前，托管理事会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

**联合国大会**由联合国所有成员组成，每年举行一届常会，必要时举行特别会议。大会可以讨论宪章范围内的任何问题或者事项，或宪章所规定的任何机关之职权，并一般可就这些问题和事项向联合国会员国或安理会提出建议。

**联合国安理会**是联合国的核心，被赋予维护国际安全的特殊权威，由常任理事国与非常任理事国共同组成。美国、苏联、中国、英国、法国为常任理事国。其责任是和平解决争端，对于那些被认为会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争端或形势，安理会在任何阶段都可以提出管理他们的程序和方法，包括通过相关决议对危及和平或实施侵略的国家施加压力，要求会员国采取非军事手段甚至必要的军事行动以这些决议。安理会的表决遵循雅尔塔公式表决非程序性问题。

**国际法院**按照国际法解决各国向它提交的法律争端，针对正式认可的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提交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秘书处**为联合国其他主要机关服务，并执行这些机关制订的方案与政策。秘书长得将其所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任何事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

第三讲 战后初期盟国的合作与美苏冷战的爆发

2024.3.12

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与本质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大国合作。战后初期，大国合作得以延续，但其内生矛盾迅速扩展。战略目标冲突导致美苏矛盾尖锐化。杜鲁门主义标志着美国着手遏制苏联，这意味着雅尔塔体制下大国合作被事实上的对立阵营关系取代，美苏冷战由此爆发。

一、战后初期盟国的合作

（一）波茨坦会议

1945年5月，杜鲁门接替病逝的罗斯福出任美国总统，提议举行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谈。7月17日开始，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进行了会谈。会议过程中，三国元首中赢得战争但输掉选举的丘吉尔被工党政府首相艾德礼取代。

1. 处置德国的问题

三国均同意分区占领德国，其中东部由苏联占领，西部由英、美、法再分区占领。三国共同分区占领大柏林区。从西部德国占领区到西柏林的通行和运输方面，双方在陆路和水路并没有签订协议，而是在空中规定了三条航道。自此，二战的军事进程结束。

美苏英中法组建五国外长会议，负责准备对德合约。期间，由于解放战争，中国（中华民国）外长临时退出。于是四国外长会议上规定了处置德国的基本原则：

**——政治上的清算方面，**对纳粹德国时期的政府军队任职人员进行审判，在德国国内进行反纳粹教育；

**——经济上的赔偿方面，**美国指出德国已经无法执行雅尔塔会议所确定的赔偿原则，苏联则坚持德国必须按照雅尔塔会议的约定进行赔偿。最终得出折中方案，大体同意苏联提出的赔偿方式，即德国的赔偿中约1/2归苏联，但赔偿的总额待定。

此外，会议还讨论了船舶处置问题、东普鲁士柯尼斯堡转让问题、德国战犯处理问题、奥地利处置问题等。

2. 波兰与德国的疆界问题

波兰与德国的疆界问题最后划定由和会加以解决。波茨坦会议上临时达成了划分方案：奥德-尼斯河一线以东的领土，以及部分东普鲁士和前但泽自由区由波兰政府管辖。

3. 对仆从国的处置

美国提倡撤销对意大利的管制并将其纳入联合国，但反对给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芬兰同样的待遇，意在维持西方阵营的完整性，并削弱苏东集团的话语权。苏联则要求英美恢复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芬兰的关系。最终得出妥协方案，即通过缔结合约的方式分别解决。

（二）仆从国问题的解决

二战后，意大利本土被美英占领，殖民地被英国占领。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芬兰全部或部分被苏联占领。

在仆从国问题上，同盟国之间的分歧在于：苏联认为要通过合约确认相应的停战条款，“承认占领现状”，取得地中海商船基地；美国希望通过合约拿到停战协定中没有的东西，“在东欧获得一个立足点”，避免苏联在地中海确立地位。

1945年9~10月，伦敦五国外长会议；12月，莫斯科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1946年初，美英苏法四国副外长伦敦会议；4月，四大国巴黎会议。这些漫长的会议都涉及了仆从国处置问题，但基本上都无果而终。

1946年7~10月，五国合约巴黎和会召开，19国正式代表、7国协商代表、5国战败代表参加。美苏在焦点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但最终达成妥协。1946年11月中旬，四大国外长纽约会议最终确定了五国合约的文本，也确定了对仆从国的处置。

二、美苏矛盾的迅速发展

（一）美苏战略目标的冲突

二战后，美国走向世界主义，希望构建面向全球的世界主义战略，全面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这是因为在二战结束时，美国拥有世界75%的黄金，贡献了约2/3的全球GDP，并且垄断了核武器，综合国力全面领先，确实有主导世界的条件。

苏联则谋求保障安全和独占势力范围。苏联在二战中蒙受了巨大损失，因此在战后需要部分依靠东欧的卫星国以恢复并发展工业，从而需要维护势力范围。

（二）雅尔塔体系的内生缺陷

雅尔塔体系是二战后出现的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和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分庭抗礼的国际关系格局。

在世界主义的最初构想方面，罗斯福在1943年4月的“世界蓝图”中提出了对战后组织的设想：能切实有效地维护和平、美国的领导作用、实际的行动能力。然而，雅尔塔体系的问题在于，其与最初构想存在不同，分歧在于是统一的国际安排还是分割的势力范围。

* **美国方面，**罗斯福设想的是美国主导下的大国合作；对苏联做出的妥协旨在吸引苏联加入美国主导下的大国合作体系；保障世界和平依靠的是集体安全，而不是联盟。
* **英国方面，**丘吉尔设想的是借船出海，以“英国的智慧”指挥美国的力量，维持甚至是恢复大英帝国的昔日荣耀，制衡实力迅速膨胀的苏联。
* **苏联方面，**斯大林重视环绕苏联边境的缓冲区与卫星国。

（三）东欧问题的争执

在二战之前，东欧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反苏且反共的；二战中前期，东欧各国被德国侵略、占领或傀儡后，其国家往往或是参与了对苏作战，或是在英美建立了流亡政府；二战后期，多数东欧的轴心国占领区都是被苏联解放并占领的。这种历史问题导致了二战后在东欧围绕政权以及控制和渗透的争议，因为就利益而言苏联显然不愿意将这些控制的国家拱手让人，从而也不会允许这些国家进行自由民选。

中欧方面，德国的最终处置问题，以及奥地利的合约如何缔结，这些问题一直持续到1955年才得以解决。

（四）战后初期美苏矛盾的激化

远东问题上，美国单独占领了日本，而苏联对远东势力范围也有追求，包括中国东北、旅顺、大连，以及日本的北方四岛。

美国在占领日本时期，进行了改革：

* **政治和军事方面，**进行了整肃，包括解散黑龙会、大政翼赞会等极端民族主义政党，解除公职令（71万人受到甄别，20万人受到整肃），解散军队和准军事组织，逮捕和审判战犯等。这一套措施在美国日后的军事占领中也有体现，如对伊拉克；
* **社会民主方面，**发布了言论和新闻自由指令等五大指令；
* **修改宪法，改造日本政治制度。**保留天皇制，但其权力必须受宪法限制并从属于人民最高意志；日本永远放弃战争和战争准备；废除日本国内一切封建制度；
* 解散财阀，实现经济生活民主化；
* 农地改革。

然而，如上的改革进程被朝鲜战争中断了，导致政治军事清算和社会民主改革都不彻底，一批军国主义和右翼分子以及未完全解散的财阀参与到了日本战后的国家重建。总之，日本至今仍有军国主义遗毒，可总结为以下三个原因：

* 文化思想上没有彻底切断；
* 军国主义和右翼政治精英的家族传承；
* 财阀解散不彻底，在经济上延续。

中东和地中海问题方面，有苏联在伊朗的驻军问题，以及苏联和土耳其关于1936年蒙特勒公约的修改问题（包括黑海通行权、在黑海沿岸建立军事基地的问题）。

三、遏制战略的酝酿与杜鲁门主义的提出

（一）遏制战略的酝酿

1. 资本主义总危机演说与“长电报”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强调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到来。虽然这一演说并非战备演说，其演说内容也是苏联一贯的学说，但西方认为这可能是苏联潜在的威胁态度。

随后，美国驻苏的外交人员乔治·凯南（1904~2005）匿名撰写了“长电报”，长篇大论而系统地阐述了他所认为的苏联关于世界事务的基本观念、苏联对外政策的逻辑以及美国应该采取的对策。凯南提出，苏联（俄罗斯）存在深刻的不安感，其缓和内部矛盾和不安感的途径就是外部扩张；苏联之所以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仅是为了其外交行为提供辩护，其目的并不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共产主义政权；苏联对理性的逻辑不敏感，但重视实力的逻辑；苏联在多数时候会虚张声势，因此美国不但应当发挥军事实力进行围堵和控制，而且要发挥文化和经济上的比较优势。这篇“长电报”还正式提出了遏制理论。

俄国的政治行为就像一条溪流，只要环境许可，就不停地朝着一个既定的目标推进。它最在乎的是，在世界权力的大盆地中，尽量灌注它所触及每一个角落和缝隙。如果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它会达观地接受并适应这一现实。

——乔治·凯南《苏联行为的根源》

2. 富尔敦演说

1946年3月5日，在密苏里州富尔敦威斯敏斯特学院，美国总统杜鲁门邀请了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也就是著名的铁幕（Iron Curtain）演说。

从波罗的海边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

——温斯顿·丘吉尔《和平砥柱》

丘吉尔提出，铁幕之后的东欧、中欧国家都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而共产党的“第五纵队”则遍布世界各国，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威胁；以英联邦与英帝国为一方应与以美国为另一方建立特殊关系，西方民主国家团结一致。

在克利福德报告《美国与苏联关系》中提出：要采取步骤遏制苏联进一步的扩张，拥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援反抗苏联的斗争，使得公众充分了解情况。

（二）杜鲁门主义

杜鲁门主义是遏制的实践与扭曲。在希腊、土耳其危机（共产主义游击队有望取得革命胜利，希、土政府无力压制）中，1947年2月21日，英国政府向美国政府照会。英国提出，其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将使得英国在3月31日后无力继续向希腊、土耳其提供援助，希望美国接替。美国认为，这是英国将自由世界领袖交接给了美国，美国必须挺身而出，取代英国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

1947年2月27日，白宫与两院领袖进行了关于援助计划的讨论。在两院占优势地位的共和党支持了民主党总统杜鲁门的策略，两党在国家利益尤其是对外战略和国家安全上坚持了合作的底线。

一个烂苹果会烂掉整桶苹果。

——迪安·艾奇逊，美国第51任国务卿，用“烂苹果”类比苏联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发表国情咨文。他提出，通过直接或间接侵犯而强加于各国自由人民的极权政权，削弱着国际和平的基础，因而也危害着美国的安全。他要求国会同意在1948年6月30日前提供4亿美元，用于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

总之，杜鲁门主义显示了当时美国无限的力量与无限的目标。杜鲁门主义认为，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

（三）凯南对遏制战略的进一步阐述

乔治·凯南在发表“长电报”后，职务经历了跃迁式的变迁：从美国驻苏联代办，到国家军事学院对外事务副院长，再到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主任。凯南的升迁在一方面是因为其理论迎合了杜鲁门政府的预设战略与期望结果；也因此，在杜鲁门政府之后，美国的遏制战略逐渐变得与凯南所设想的大为不同，他随后也退出了国务院的工作。

凯南指出，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包括：

* 捍卫国家安全：这意味着这个国家始终有能力在不受外国严重干涉或干涉威胁的情况下追求自身内部生活的发展；
* 推进本国人民的福利：办法是促进这么一种世界秩序——在其中，这个国家能够对其他国家的和平和有序的发展做出最大限度的贡献。

凯南的逻辑是遏制。苏联行为的根源是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以及由此引发的深刻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根植于苏联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历史传统之中。意识形态更多的是对行动的辩解，而不是指南。

凯南指出了苏联威胁的本质。他认为，苏联并不愿意冒战争的风险，心理威胁比实际威胁更加严重。打动国家心灵并影响其行为的是事物的影像，而非事物的实质。

在遏制手段的选择方面，凯南指出，可以通过鼓励受苏联扩张主义威胁的国家的内部自信来恢复均势；利用莫斯科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减少将势力投射到国境以外的能力；假以时日，逐渐修正苏联的国际关系思想，以期导致谈判解决突出的分歧。

凯南还提出了以下潜在假设：

* 武器和部队水平不是国际权势的唯一决定因素——政治、心理和经济同样起作用；
* 在经济领域里，美国拥有特殊的优势：通过贷款和无偿赠予，只有美国才处于一种独有的优势地位；
* 分配美国援助的三个具体标准：
  + 是否存在任何值得加强的当地抵抗力量；
  + 遭到挑战的地区对于我们自己安全的重要性；
  + 可能支付的代价，是否能够与可能取得成果成比例。

凯南的这些理论体现了其研究背景，但缺乏实际政策制定的经验。在政策制定者看来，不仅要考虑国际战略，还要考虑国内政治影响。例如，虽然“政治、心理和经济同样起作用”，但对于美国总统而言，调动军队显然是最容易的；又例如，本国内存在大量的代表了不同利益的游说集团，但外国的“当地抵抗力量”往往没有游说途径，因此前者反而更能影响决策。

在实践上，凯南的遏制战略体现为美苏在局部关键地区的对峙，进而导致了冷战期间的多个危机；或双方扶持各自的代理人，进行长期低烈度的冲突。

第四讲 两大阵营的形成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初步胜利

2024.3.19 / 2024.3.26

最近美国方面要求Tiktok的母公司撤资，并出售给一家美国公司，这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自二战结束以来倡导的现代化路线不符，是其曾认为的“第三世界的专制国家”的行为。此种行为，从依附论的角度来看，无异于宗主国对殖民地的行为：中心的宗主国向外围输出工业制成品，而外围的殖民地则向中心输入农产品、低级工业产品等，在今天则是数据。

可见，改革开放以来“融入西方现代化道路，不谈民族解放”的方针是错误的，只有民族解放才能在上述事件的类似情况中站稳脚跟。民族解放的叙事在当今仍需要被提起。

一、两大阵营的形成

（一）大西洋联盟的形成

1. 西欧面临严重困境

战争造成了重大的破坏和损伤。二战期间，空军的战略轰炸理论获得了充足的发展和实践，轰炸机对工业区、经济区、人口密集区的轰炸不仅能摧毁对方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基础，而且还能严重打击对方的士气。二战初期，轴心国对同盟国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战略轰炸；二战后期，同盟国也报复式地对轴心国进行了大规模战略轰炸。这导致二战之后，欧洲的诸多城市都一片残垣断壁。

战时经济体制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战时的经济运行模式转回非战时的经济运行模式，是一种难以进行的“急刹车”。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体系迅速瓦解。纳粹德国的动员体制建立在反犹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上；实践上，德国政治化、标签化、流水线式地进行了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纳粹的反人类行径使得二战的道义属性比一战更强，美国借此提倡尊重主权、民族自决等理念，推进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的殖民地体系瓦解。

西欧面临极端严寒天气的冲击和挑战。倘若当时欧洲各国的政府无法提供足量的煤炭，则战后西欧很可能会出现一场规模性的死亡。

工人运动和共产党力量迅速发展，影响急剧扩大。战时工人体制导致了工人运动（主要是产业工人的运动）在西欧各国迅速膨胀，尤其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在选举中一度有占优的趋势。

2. 马歇尔计划

二战后，美国的租借法案与“善后救济”逐渐终止。美方重视援助西欧的战略意义，苏联的拖延症战术将诱发西欧经济崩溃，美国必须加速在经济上复兴西欧；随后，《关于美国援助西欧的政策》报告出台，确认了援助的必要性。当时的美国具有执行力强的体制以及庞大的资源，故其援助欧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都较大。

援助欧洲的方法是：欧洲必须自助和互助；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对待，意味着对欧洲的轴心国同样要进行援助；苏联和东欧要得到援助必须接受美国的条件，否则便要被排除在外。美国的条件是获悉东欧各国的经济情况，这对苏联是一个两难：倘若拒绝美国，就会招致东欧各国对苏联的高度不满；倘若答应美国，则东欧各国都会接入西方的经济体系之中，受到美国的控制。此外，美国还提出东欧各国要加入欧洲统一市场，而苏联的经济体制与美国（及西欧）的经济体制并不兼容，这样的提议无疑是“双刃剑”。最终，苏联拒绝了美国的提议。

1947年6月5日，哈佛大学授予马歇尔名誉学位，马歇尔借此机会发表演说，提出了援助欧洲的必要性：如果美国不能提供援助，就会导致其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非常严重的恶化，对美国经济会造成严峻威胁。他指出，美国的援助是一种治疗而非纯粹的镇痛剂。

随后，欧洲对马歇尔演说积极回应。1947年举行了巴黎专家会议；之后组建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提出了复兴欧洲经济四原则：各国努力发展生产；维持国内的财政稳定；在参加国之间发展经济合作；采取措施解决参加国与美洲大陆之间的贸易赤字；美国于四年内提供280亿美元的援助。

美国着手推进马歇尔计划。杜鲁门出台《美国支持欧洲复兴计划》，国会通过《1948年对外援助法》，确定了援助细则：提供援助额度，实施物资援助；受援国可出售物资并支配其中的95%，美国支配其中的5%——虽然5%的份额似乎不大，但这是美国实行政治扶持的重要手段之一。

对马歇尔计划，欧洲也有进一步回应，即签署了《欧洲经济合作公约》。

总之，马歇尔计划通过紧急输血，推动了欧洲经济复兴；推动了西欧国家之间的合作；推动了美元资本打开西欧大门。

3.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二战后，英国确认了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在和平时期不与欧洲大陆签订条约，维持离岸平衡）无法持续，三环外交（英美、英联邦、英欧）成为新的指导思想。法国也需要调整欧洲政策，因此英法两国迅速靠拢，签署了《敦刻尔克条约》。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随后签署了《布鲁塞尔条约》。

然而，针对以上条约，美国与欧洲争论了欧洲安全的范围和义务问题。美国提出，这些条约有着解决（覆盖）的范围太窄、牵涉的义务太多的缺陷。于是美国提出了大西洋联盟政策：大西洋东、西两岸的国家缔结一项有助于避免布约固有弱点的“区域性集体防护协定”；推动《范登保决议》的通过。美国由此启动了北大西洋公约的盟约谈判。

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约》签署。其集体防御条款是：

**第四条** 无论何时任何一缔约国认为缔约国中任何一国领土之完整、政治独立或安全遭受威胁，各缔约国应共同协商。

**第五条** 各缔约国同意对于欧洲或北美之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因此，缔约国同意如此种武装攻击发生，每一缔约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承认之单独或集体自卫权利之行使，应单独并会同其他缔约国采取视为必要之行动，包括武力之使用，协助被攻击之一国或数国以恢复并维持北大西洋区域之安全。此等武装攻击及因此而采取之一切措施，均应立即呈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安全理事会采取恢复并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必要措施时，此项措施应即终止。

——《北大西洋公约》

北约的机构构成包括理事会、防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

《北大西洋公约》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冷战时期西方集团的核心确定；提供了遏制苏联的重要工具；奠定了战后美国-欧洲关系的基础，形成了“美国保护（主导）下的欧洲”；美国孤立主义的结束。

（二）东方阵营的初步形成

东方阵营有一个特点，即除了国家之外，东方阵营内的关系主要是党的关系，苏联对东欧各国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输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以及党的上下级组织控制关系进行的。这意味着，在西方，美国与各国虽然在实质上不平等，但在形式上是平等的；而苏联则直接以不平等的姿态影响东欧各国，这导致冷战时期苏东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东欧各国的政党缺乏合法性。总之，在一个民族主义高度觉醒并发达的世界格局下，苏联通过战时红军占领、战后控制政党的行为组成的“同盟”，是大有问题的。

东方阵营在东欧的行程是对抗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全面回应。苏联主持组建了九国组成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但其情报和特务工作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内的，这种畸形的体制在苏共二十大后也宣告解散。

苏联推行了莫洛托夫计划，建立了经互会；随后又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

二、柏林危机和两个德国的出现

（一）第一次柏林危机

在德国分裂占领之后，在处置德国的方案上，美、英、法、苏进行了争论，主要是先进行政治复苏还是经济复苏。如果先政治复苏，则德国人民更有可能将共产党选上台；如果先经济复苏，则共产党的民众支持率可能会逐渐式微。美苏在德国事务上的矛盾逐渐加深，四国外长会议随之失败。

在东占区和西占区，货币改革分别展开，先后形成了西德马克和东德马克。1948年6月的货币改革被认为是德国正式分裂的开始。6月24日，苏联开始对进出柏林的陆地和水上交通进行管制，美国则强硬维系对柏林的空中运输通道，长达324天。需要注意的是，美苏双方的行为都有其国际法依据，这就形成了“国际法下的大国竞争”的现象。

1949年5月后，由于蒙受损失，苏联放弃将货币改革问题和柏林封锁问题挂钩，西方亦做出积极回应，第一次柏林危机结束。

下面是第一次柏林危机的时间线：

* **1947年11月~12月：**伦敦外长会议，美苏公开决裂；
* **1948年2月~6月：**六国伦敦会议，伦敦协议，决定成立西德；
* **1948年2月：**苏联改组苏占区经济委员会；
* **1948年3月：**苏联开始限制限制进出柏林的地面交通；
* **1948年4月5日：**撞机事件；
* **1948年6月：**
  + **6月18日：**西占区发行B记马克；
  + **6月19日：**苏联封锁全部进出柏林-西德水陆交通；
  + **6月22日：**苏占区发行D记马克；
  + **6月29日：**美国强化对柏林空运；
* **1949年1月27日：**斯大林对美国国际新闻社欧洲分社社长暗示解除封锁；
* **1949年5月：**
  + **5月5日：**四国联合公报；
  + **5月12日：**解除封锁。

（二）德国分裂的加深

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缓和，意味着美苏双方都意识到德国分裂不可避免，自身无法将对方占领的德国转移到自己的控制下，亦不可能因此与对方开战。1948年9月至1949年5月，西占区召开制宪会议，组建联邦德国；作为回应，苏占区也着手组建民主德国。至此，德国正式分裂。

下面是德国分裂加深的时间线：

* **1948年8月：**美英法三方委员会起草占领法；
* **1948年9月：**西德议会委员开会；
* **1949年3月：**东德宪法起草委员会；
* **1949年4月：**英法就占领法规达成协议；
* **1949年5月：**西德议会委员通过基本法；
* **1949年5月12日：**解除柏林封锁当天，西占区公布西德基本法；
* **1949年5月23日~6月20日：**四国外长会议失败；
* **1949年8月：**议会选举；
* **1949年9月：**特奥多尔·豪斯总统，康拉德·阿登纳总理，美英法保留管制联邦德国外交、国防的权力；
* **1949年10月：**东德成立（威廉·皮克总统，奥托·格罗提渥部长会议主席）。

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初步胜利

（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经过战争，各民族的思想觉悟和政治上及军事上的组织程度空前提升；传统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遭遇沉重打击，财政、军力和国内政治意志都不足以继续支撑殖民体系，殖民体系在能力上瓦解；二战和一战在道德意义上不同，二战后美国有能力且有国内政治意志使其塑造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殖民体系在声望上瓦解；苏联崛起和东方阵营影响持续扩大。

这段时期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显著特征是：斗争遍及亚非拉广大地区；在各地区呈现多样性，拉丁美洲侧重反对美国尤其是美国资本的干涉，北非和西亚强调脱离英法控制，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南亚、东南亚强调民族自治和消除影响；进程曲折。

（二）西方国家的对策

西方前宗主国面对反殖民化浪潮，推出了去殖民化（非殖民化）政策，即宗主国发动的推动原殖民地独立的政策。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宗主国为了保障自身利益，往往会为殖民地的独立之路添设障碍，使得殖民地在独立过程中以及独立后蒙受损失。

新兴超级大国美国则在政治、军事和知识等方面积极干预，甚至在摧毁殖民体系问题上与苏联合作。例如第二次中东战争中，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后，英、法、以武装介入，希望保持地区利益甚至再殖民埃及。而美国随后进行了石油禁运并抛售英镑、法郎，苏联也发出警告，给英法以重大打击。

美国还与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了政治独立与经济独立的博弈和交易，除了保障美国在当地的经济利益，美国还希望扶持具有反共、反苏意识形态的政权。然而，由于同一时期的苏联高举着民族解放的大旗，吸引了诸多进步民族独立人士，故美国所能扶持的往往是保守落后的势力。

（三）殖民体系在亚洲的最初崩溃

南亚方面，英国提出了蒙巴顿方案，实现了印巴分治；东南亚方面，越南、印尼是代表性的突破；东北亚方面，美国试图扶持国民党政权下的买办势力，但中国的解放战争仍然胜利了；朝鲜半岛在朝鲜战争之后则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民族解放运动在冷战结束之后，普遍进入了停滞的状态。大多数民族解放运动都建立了独立的政权，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但它们往往还需要建立一套经济上的独立体系，以保证政权的稳定性。

第五讲 两大阵营的激烈对抗与中立主义运动

2024.3.26

一、东西方在亚洲的对抗

（一）东方阵营向亚洲的扩展

在朝鲜半岛，以北纬38度线南北为界限，美苏分别受理了驻朝日军的投降，也导致了朝鲜与韩国的分裂。早在1943年《开罗宣言》中，就提出要“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可见三八线实属“从天而降”。1945年8月15日，苏联进入朝鲜北部；9月8日，美国军队进入朝鲜南部。1945年12月，三国莫斯科外长会议。1947~1948年，南北朝鲜分别选举成立政府。

越南谋求独立的进程十分艰巨。1945年，八月革命推翻了保大傀儡政权；胡志明宣读了《独立宣言》。越南在确保稳固独立的努力包括抗击法国恢复殖民秩序的努力以及谋求与苏联发展关系获得更有效的保护。

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中国外交“一边倒”，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深刻改变了东亚以及印支半岛的地缘态势。

（二）朝鲜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围绕战争起因有所争论。中国对朝鲜战争的态度包括是否应该主动攻击、如何对待美国可能的威胁、介入朝鲜战争的决策等。苏联中国对与朝鲜战争态度则发生了变化，苏联从支持朝鲜变为了避免直接冲突，使中国面对着在缺乏空中掩护和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如何应对美国跨过三八线的问题。

朝鲜战争的进程如下：

* **第一阶段，1950年6月25日~1950年12月**
  + 朝鲜的战略进攻
  + 仁川登陆与朝鲜军队的崩溃
* **第二阶段，1950年12月31日~1951年6月10日**
  + 中国入朝作战
  + 五次战役与战线的相对稳定
    - 1950年10月19日
    - 1950年11月24日~12月5日
    - 1950年12月31日
    - 1951年1月（换将，“星期攻势”与“月光攻势”）
    - 1951年4月22日~29日
* **第三阶段，1951年7月10日~1953年7月27日**
  + 谈判与局部交战
  + 交换战俘问题

朝鲜战争是超级大国在地方对抗渗透的产物。中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和军事人员伤亡，得到的收益包括稳固了与苏联的关系，使美国意识到与中国冲突没有收益，保障了东北工业基地的安全。

（三）越南抗法战争

1946年12月，越南抗法战争开始，直至1954年8月结束。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朝鲜战争的爆发大大鼓舞越南的抗法斗争。期间，美国介入支持法国在越南的行动。

奠边府战役法国失败后，在五大国日内瓦会议中，达成了日内瓦宣言，美国则在其中展现出了暧昧的态度。

（四）美国构建西太平洋同盟体系

为构建西太平洋同盟体系，对抗东方阵营的扩展，美国提出了以下方案：

* 太平洋公约草案
*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
* 澳、新、美安全条约
* 对日媾和
  + 签署对日合约7原则形成
  + 旧金山对日和会与旧金山和约
  + 日美安全条约
* 美韩共同防御条约
* 《军事协调谅解协定》
* 《共同防御条约》
* 《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

美国对日媾和，标志着美国放弃了对日本战争责任的彻底清算；除了保留天皇体制之外，还放弃了在思想层面剔除军国主义思想。《旧金山和平条约》是当代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国际法基础，然而该条约并未被我国签订与承认。

考虑到二战期间日本对朝鲜半岛、东南亚、澳新等地区的罪行，以及澳洲与亚洲之间的文化民族差异，美国所构建的西太平洋同盟体系呈现一种轮毂状：以美国为中心，向外连接着日本（美日关系）、韩国（美韩关系）、澳大利亚（美澳关系）等国家或地区，而这些外围国家和地区之间则不发生强关系。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1928~2017）提出，美国在二战之后的亚太战略具有两个支点：一个支点是澳大利亚，另一个支点则是中日——日本作为立足点，中国作为主要威胁。

二、东西方在欧洲的对抗

（一）舒曼计划和普利文计划

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德国，在二战之后应被解除武装，去军事化。然而，由于西德的经济、科技、人力与军事资产有利于西方阵营的军力提升，重新武装德国再次被提上议程。1950年，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1886~1963）提出了舒曼计划，推动了法国与德国的煤钢联营。

法国希望能设置一个框架，从而将德国约束在其中，而这个框架就是欧洲军（普利文计划）：对外面对苏联的威胁，向后排除英国影响，欧洲军由法国主导，德国则提供军力。然而，由于相比美苏两国而言，欧洲的军事实力都不如两者，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超国家防务构想都是欧洲一体化的政治禁忌话题，这一构想也自然受挫了。

（二）巴黎协定与北约的扩大

西德无法通过欧洲防务协定再武装化，转而通过北约进行再武装化。艾登计划、巴黎协定都支持了这一进程。

（三）华约的缔结

1955年5月，《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也即华沙条约签订。然而，相比北约，华约内部的关系一直不佳，如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等。

三、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加强

在两大阵营对抗的同时，中立主义对外政策也在发展，不结盟运动即是其中的一例。面对中国周边的国家对中国的威胁性认识的现实，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实行了对自身的约束和限制。

1955年，万隆会议举办，是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这是首次没有发达国家参加，仅由发展中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

第六讲 美苏关系的第一次缓和与两个阵营的动荡

2024.4.2 / 2024.4.9

冷战之所以被称为“冷战”，就在于美苏双方之间并没有大规模武装冲突。从1945年起至1991年冷战结束，冷战的起伏呈现一定的周期性（不是固定的时间周期）：局势激烈时，双方意识到大规模武装冲突不符合各自的利益，于是选择缓和；缓和时期，双方固有的未解决的矛盾就又浮出水面，并通过具有一定偶然性的事件予以激化。双方领导人的个人特质和施政方针也同样影响着冷战的走向。总之，冷战的起伏节点可概括为“事件驱动，领导人变化”。

冷战一旦缓和，双方阵营内部就出现矛盾。当然，冷战中的西方阵营在意识形态、经济制度等方面的一致性比苏东阵营要高，这是因为后者在建立过程中采取了相当部分的建立在强力基础上的不当做法。

一、美苏关系的第一次缓和

（一）苏共二十大及外交政策调整

1. 斯大林逝世之后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1953年9月，赫鲁晓夫出任第一书记，1958年3月取代马林科夫出任部长会议主席；1953年5月30日，苏联声明放弃对土耳其的领土要求，同时也放弃共同保障黑海海峡安全的要求。这些事件被认为是缓和的开始。

在苏联内部，斯大林逝世后，1953年12月，内务人民委员拉夫连季·贝利亚被执行死刑；党内逐渐形成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的“三驾马车”，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的权力斗争影也响了匈牙利的局势。

教授认为，冷战期间苏联存在两个贯穿了每个领导人的致命问题：第一，没有处理好经济问题这个影响综合国力的根本因素；第二，在每一次政策转向时都要求其阵营内部的成员进行同样的转向（例如下文的外交转向），导致阵营内部矛盾重重。

2. 苏共二十大的外交政策调整

苏共二十大上提出和平共处的原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 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使得和平力量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物质手段；
* 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拥护和平运动成为防止战争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
* 和平共处的理论基础是战争可以避免，“是苏联外交的基本原则”；
* 和平竞赛，“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赛中，社会主义体系必将取得胜利”；
* 和平过渡，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实现过渡”。

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开始重视对第三世界的争夺；重视改善内部关系，如结束东德的战争赔偿，归还旅大并推进中苏合作，解散九国工人党情报局以缓解和东欧各国及南斯拉夫的关系。斯大林时期保守路线的继承者莫洛托夫也在苏共二十大后去职。

总之，这一时期，苏联的外交目标转变为：减轻政治和军事压力、发展本国经济、分化美国和西欧关系、鼓励不结盟运动。苏联以缓和取代全面对抗，获得了外交上的主动权和较大的活动空间；但其把“和平共处”强制作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总路线，表现出粗鲁的大国主义作风，并最终成为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渊源。

（二）美国对外战略的改变

艾森豪威尔政府任期是1953~1960年。这一时期，美国总统是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是杜勒斯。教授认为，决定美国战略的重要人物有三个：总统、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并且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通常只有二者之一较为强势，另一者较弱势。

政治方面，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以“解放”取代“遏制”：既然认为共产主义是“邪恶”的意识形态，那为何美国还要置东欧各国于“邪恶意识形态”之下？这似乎不符合美国的国际形象。因此，应该尝试渗透东欧各国，改变它们的意识形态，从而以非战争手段，促使东欧国家摆脱苏联的控制。然而，在政治上的这一激进行为，在实践上往往招致困难：当东欧国家真正发生脱离苏联控制的运动时，美国通常不会予以实质支持以防与苏联直接冲突，仅发表政治性、道义性的声明，属于“给予帮助以外的一切支持”。

军事方面，提出了“大规模报复战略”——“在我们选择的地点，以我们选择的武器进行大规模报复。”这是一种在绝对核优势基础上的有限防务政策，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可以同样使用，核武器的杀伤力保证了核武器比常规武器更加划算。与绝对核优势相伴的是相对保守的常规部队规模，这是由艾森豪威尔政府平衡收支的施政方针决定的。

（三）东西方关系的解冻与缓和

1. 苏联和平攻势与奥地利国家条约

苏联方面，1954年初，马林科夫表示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1955年，和平共处已经成为“必要和可能”；1955年，宣布结束“苏德战争状态”，与联邦德国建交；签署奥地利国家条约；主动访问南斯拉夫；参与四国首脑日内瓦会议；单方面裁军64万；放弃租界赫尔辛基附近的海军基地；促进东西方贸易增长；出访印度、缅甸和阿富汗。

1955年3月，莫洛托夫提出四大国同时撤离奥地利，修改了与德国问题挂钩的做法。1955年4月12~15日，苏奥莫斯科会谈； 5月15日，发布《重建独立和民主奥地利的国家条约》； 10月26日，奥地利发布中立条文：永久中立、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允许在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

奥地利条约被认为是“双赢”的。就苏联而言，中欧的资本主义国家奥地利采取中立政策，有利于苏联的安全；中立化倾向有助于从内部瓦解大西洋联盟。就美国而言，这是苏联态度已经发生变化的证明；苏联红军自1945年以来第一次向后转，是美国实力政策生效的结果。

2. 日内瓦首脑会议

1955年5月10日，苏联向美国发出召开首脑会议的照会；同日，苏联提出裁军建议。冷战时期的首脑会议标志着一个转变，即从职业外交（由接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外交官主要参与的外交）转变为元首外交。

1955年7月18日，日内瓦首脑会议召开。双方就“德国统一”和“国际安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讨论。艾森豪威尔提出了“开放天空”建议。这是东西方首脑致冷战开始后第一次正式协商国际会议，是小“缓和”开始阶段的重要标志。

3. 苏联的建交行动

1955年6月7日，苏联照会联邦德国，实现关系正常化；6月30日，复照德国，接受邀请；9月8日，苏德建交谈判，德国提出统一、遣返战俘，苏联则表示优先建交，其他事务日后再议；9月13日，建交换文，德国同意先建交，苏联同意先释放战犯。

苏联与西德建交后，面对西方阵营内部的质疑，阿登纳发表了换文发言，主旨在于“德国的东部不是最终的边界”，以打消西方盟国的忧虑；塔斯社则指出，德国边界由波茨坦协定解决了，联邦德国无权代表整个德国人民。1955年9月20日，苏联与民主德国签署两国关系条约。由此，两德在法理上正式分裂为两个在联合国各有一个席位的主权国家。

1954年12月15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实现苏日关系正常化。1955~1956年，苏日进行了建交谈判，讨论了北方领土问题。1956年10月19日，《苏日共同宣言》发表。

4. 美苏首脑戴维营会谈

1957年夏，苏联试射了首枚洲际弹道导弹，随后又发射了人类首枚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这向美国证明了苏联已掌握了洲际弹道导弹的技术。

1957年10月，赫鲁晓夫表示希望访问美国；1958年11月，苏联发表关于结束柏林占领制度的声明，声明了6个月的期限——这是赫鲁晓夫的“讹诈”，期望以强硬态度换取美国的单独会谈；1959年1月，米高杨重新解释6个月期限；1959年5月，四大国外长会议；1959年7月，美国正式邀请赫鲁晓夫访问美国；1959年9月15日~28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赫鲁晓夫访美期间，美苏首脑在戴维营进行了会谈，主要问题包括柏林问题、裁军问题。1959年9月28日发表的联合公报上收回了6个月的期限。戴维营会议塑造了“美苏平起平坐的印象”，以及所谓的戴维营精神。戴维营会议是冷战第一次缓和的顶点，开创了两个超级大国通过首脑会晤形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

（四）第二次柏林危机与第一次缓和的受挫

1958年11月，关于西柏林的地位问题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开始，赫鲁晓夫要求在六个月内把与西柏林的所有通讯线路的控制权移交给东德，解决所谓“柏林地位问题”；美、英、法则明确表示了坚决决心保留并维护其自由进入西柏林的合法权利。1959年5月，苏联撤回该要求，并在之后赫鲁晓夫访美的戴维营会议上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

然而，1960年5月，U2高空侦察机事件发生，苏联在其领空内击落了一架美国U2侦察机。美苏双方的关系再次降到低点，艾森豪威尔回访苏联的进程也就此中断。第一次缓和受挫后，美苏导弹竞赛开始。

二、两大阵营的内部动荡

（一）东方阵营内部的矛盾

1. 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企图改变对东欧的严格控制，谋求突破。更重要的是，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在不提前知会的情况下，赫鲁晓夫于当天凌晨进行了长达4小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2. 波兰和匈牙利事件

1956年6月，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影响下，波兰斯大林机车厂工人罢工，随后被镇压，是为“波兹南事件”。苏共中央指出这是“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行为，波兰则顶住了苏联的压力，释放了在此次事件中的大部分扣押的群众，解除了罗科索夫斯基的国防部长职务，并宣称即将在八中全会上平反哥穆尔卡。赫鲁晓夫则选择以坦克开进华沙施压，但波兰方面不让寸步；在哥穆尔卡与赫鲁晓夫会谈之后，赫鲁晓夫被迫选择让步，苏联不干涉波兰国内事务。波兰从而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10月，哥穆尔卡当选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

在匈牙利，苏共二十大之前，保守派的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马加什与改革派的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伊姆雷进行着权力斗争。苏共二十大后，由于全盘否定斯大林，遵循斯大林路线的拉科西陷入下风，格罗·埃诺接任了他的位置。波兰的八中全会协议以及哥穆尔卡的复出影响到了匈牙利，布达佩斯产生了大规模游行，此时，格罗与纳吉的任意一方都无法完全掌控匈牙利局势。秉持“解放”方针的美国趁虚而入，通过运作电台进行煽动。

10月22日，“匈牙利革命”开始。在布达佩斯，民众围攻了广播电台大楼，格罗的演说没能平息众怒，反而起到了反效果。10月24日，苏军进入布达佩斯。10月30日，苏联宣布撤兵。然而，11月1日，苏军折返匈牙利，纳吉紧急召开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会议，宣布退出《华沙条约》，向联合国和美、苏、英、法四国求援。11月3日，苏军再次包围布达佩斯，纳吉及其派系成员进入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11月4日，匈牙利事件平息。

11月22日，纳吉等人离开大使馆，旋即被捕。1958年6月，纳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3. 中苏分歧的发展

在评价斯大林问题上，中苏产生了严重分歧。中方认为，全盘否定斯大林这个领导人，是苏联自行切除了其合法性。当然，中苏双方在这一方面的矛盾并未直接暴露。在波匈事件期间，苏联也期望得到中国的支持。

1958年，苏联方面提出，要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电台，并与中国建立联合舰队，甚至是建立军事基地。虽然这似乎符合中苏军事合作的方向，但这实际上与中国独立自主的道路并不相符，中国人民无法接受回到外国驻军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此外，中苏边境上，双方军队发生了数次摩擦；苏联还在新疆等地收买民众，策反官员，使得大批民众偷渡前往苏联。

（二）西方阵营的变化

在西方，出现了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欧洲经济共同体在煤钢共同体的基础上建立，形成了经济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煤钢共同体三大共同体，推进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1960年，新日美安保条约签订。其中取消了美方的以镇暴权为代表的过度压制日本的条款，放宽了日本发展自卫队的限制，并加强了美国保护日本的义务。这一条约虽然减少了双方的不平等地位，但仍强化了美国在日本的存在，服务于美国的亚洲战略。

三、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阶段

自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凿以来，其长期被英国和法国设置的公司所把控，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埃及却极少获益。1956年6月，英军撤出苏伊士运河，但英法仍然控制着苏伊士运河公司。7月，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为维护自身利益，英法与以色列开展了交涉。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不宣而战，大批军队开入西奈半岛，第二次中东战争（亦即苏伊士运河战争）开始。英法以调停的姿态介入，称希望双方各自退后，由英法军队构成隔离带，实际上是为了重新驻军掌控苏伊士运河。对于此条件，以色列随即表示接受，埃及表示拒绝，英法对开罗等城市展开轰炸。

苏伊士运河战争是中东地缘政治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英、法是当地地缘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主要争夺者；在此之后，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开始逐渐将西方殖民者的资产收归自有，英、法从中东全面撤离。与此同时，美、苏也由此开始试图介入中东地区。

第七讲 美苏关系的再度紧张与两大阵营内部冲突的发展

2024.4.9 / 2024.4.16

一、古巴导弹危机

（一）肯尼迪政府与美国战略转型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大规模报复战略被提出，即一旦苏联挑起涉及美国及其盟友或其他关系到美国利益的国家的常规局部战争或代理人战争，美国就有可能进行核威慑，且可能直接对苏联进行核威慑。然而，这一战略有效的前提是苏联的核武数量和核打击能力无法威胁到美国本土。1958年，苏联发射首颗人造卫星，证明其具有洲际弹道导弹技术后，大规模报复战略就陷入了困境。

在此背景下，马克斯韦尔·泰勒上将提出了“音调不定的号角”理论，主张以灵活反应战略替代大规模报复战略。这一理论主张，在保持核威慑的同时，做好在各种程度上进行常规战争乃至进行战术核打击的准备。这一理论随后也衍生出了梯度升级理论。

1961年1月20日，约翰·肯尼迪就任总统。

我要让每一个国家，无论他们对我们抱着善意还是敌意，我们将付出所有代价、担负所有责任、面对所有艰难、支持所有朋友，对抗所有敌人，来确保自由的生存与成功。

——约翰·肯尼迪，于其总统就职演说上

肯尼迪政府采取了灵活反应战略，多样化地发展核武器，适应不同需要；提出“两个半战争（2.5场战争）”，在全球范围内打好“两场战区战争，一场局部冲突”。

（二）第三次柏林危机与柏林墙

1961年7月，赫鲁晓夫于维也纳首脑会议期间重新提出6个月的照会，再度要求“解决柏林地位问题”，激化了柏林危机，第三次柏林危机开始。肯尼迪坚持要保证对西柏林的安全承诺，赫鲁晓夫则称要保障东德的边境安全。7月18日，美、英、法向苏联发出外交照会，拒绝苏联的要求。

在此情况下，美苏双方都暂停了裁军计划，追加了军事预算；肯尼迪政府动员了大量预备役人员。与此同时，东柏林爆发了逃亡高潮，在此一年中逃亡了约270万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

1961年8月3日~5日，华约莫斯科会议通过了建筑柏林墙的决议；8月13日，柏林墙开始施工，美方派出军队在施工现场附近与苏联军队及施工队对峙。9~10月，对峙局势开始缓和，双方都做了让步。苏共二十二大撤销了1961年12月31日签订条约的要求。

一切自由人，不论他们住在何方，皆是柏林市民，所以作为一个自由人，我为“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个柏林人）”这句话感到自豪。

——约翰·肯尼迪，于访问西柏林时的演说

（三）古巴导弹危机始末

1. 古巴导弹危机：酝酿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1960年7月，艾森豪威尔政府强硬表态，表示不承认革命后的古巴。然而，艾森豪威尔也并没有接受武力推翻古巴革命政权的提案。

1961年4月17日，肯尼迪政府通过了中央情报局的入侵古巴的计划，即后来的猪湾事件。这一计划夸大了古巴内部的反政府情绪以及反政府武装的实力，并因地图过时而错误地设置了登陆地点至一片难以通行的沼泽，为登陆部队提供后勤支援的舰船也被古巴军队击沉。在形势不利之时，肯尼迪不顾中央情报局的反对，拒绝授权美军直接介入，导致了行动最终失败。

猪湾事件后，古巴内部，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在革命路径上产生了分歧：前者开始寻求苏联的军事援助，后者则认为要将美国的注意力由古巴移向他处。切·格瓦拉于是在1965年时前往非洲和拉丁美洲展开革命运动。

在卡斯特罗寻求苏联军事援助后，赫鲁晓夫开始酝酿将中程导弹运入古巴，试图以中程导弹保护古巴，提高中程导弹的威慑作用。赫鲁晓夫还相信，美国会加以容忍而不做出激烈反应。

2. 古巴导弹危机：过程

1962年7月中下旬开始，苏联开始把进攻性导弹秘密运进古巴，以加强对美国的威慑力量。10月中旬，美国根据U—2型飞机的侦察，得知古巴正在修建针对美国的中、远程导弹发射场。

发现该情况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于可供选择方案进行了激烈争论，最终基本形成了四个方案：

1. **“无所作为”：**最温和的方案，由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提出。美方在联合国大会上对苏联进行控诉、谴责，此方案不会导致任何实质性结果。优点在于最大限度防止核战争，缺点在于使苏联事实上加强了对美国的核威慑。
2. **“海上封锁”：**由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提出。在古巴海岸800海里外实施封锁。
3. **“空中轰炸”：**派出美国空军对古巴展开空袭，摧毁导弹发射场。
4. **“入侵古巴”：**最激进的方案，由参联会主席马克斯维尔·泰勒提出。海陆空军队直接进入古巴。优点在于一劳永逸，缺点在于局部战争可能导致美苏之间的核战争。

肯尼迪最终选择了第二个方案。10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表电视演说，宣布武装封锁古巴，要求苏联从古巴撤出进攻性武器。23日，肯尼迪又签发禁止进攻性武器运往古巴的公告，宣布从24日起，将拦截并强行检查可能前往古巴的舰船。驻西欧和远东的美军也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洲国家组织中的盟国军队也进入戒备状态。

10月23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表示要按苏、古协议继续用武器援助古巴，坚决拒绝美国拦截，对美国的威胁将进行最强烈的回击。24日，苏联驶往古巴的船只开始返航；25日，美国在联合国展示了在古巴的苏联导弹和发射场的照片；26日，赫鲁晓夫给肯尼迪一封秘密信件，提出愿在联合国监督下从古巴撤出进攻性武器，并表示不再向古巴运送这种武器，交换条件是美国撤销对古巴的封锁，并保证不再入侵古巴。

10月27日，赫鲁晓夫重新发出措辞更加强硬的信件，为撤离导弹附加了额外的条件：美国撤出位于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同日，肯尼迪答复赫鲁晓夫26日的信件并发表白宫声明，要求苏联在联合国监督下从古巴撤出导弹，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28日，赫鲁晓夫回函，表示已下令撤除在古巴的核武器，并同意让联合国代表到古巴核实

11月1日，卡斯特罗发表电视演说，宣布拒绝联合国视察，并提出维护古巴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五点要求。11月2日~26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到古巴同古巴领导人会谈，施加压力。11月8日~11日，苏联从古巴运走了42枚导弹，并在公海上接受美国“船靠船的观察”。

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赫鲁晓夫答应将在30天内撤走在古巴的全部“伊尔-28”轰炸机，同时宣布美国取消对古巴的海上封锁。12月6日，美国国防部宣布苏联轰炸机撤出古巴。

（四）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的僵持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在达拉斯访问时，遭到刺杀身亡。

1. 苏联内部政局的变化、战略的演变与勃列日涅夫主义

1964年10月14日，勃列日涅夫等人趁赫鲁晓夫在度假时发动和平政变，赫鲁晓夫下台。此后，由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再度形成了“三驾马车”执政。苏联外交战略也变成了“缓和”掩护下的扩张战略：

* **欧洲：**通过倡导欧洲集体安全体系，鼓励欧洲的离心倾向；
* **亚洲：**大规模南下，支持越南拖住美国；强化对中国的战略挤压；
* **中东：**扩大影响。

1969年3月，勃烈日涅夫在布达佩斯提出了“欧洲缓和”的主张。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提出六点“和平纲领”，包括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承认战后欧洲现状、保障集体安全、召开五国核裁军谈判、彻底消灭残存殖民制度等，同样属于“缓和战略”。

在缓和战略下，苏联继续着其扩张，在理论上体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国际分工论、大国特殊责任论等。

2. 新一轮军备竞赛与禁止核试验条约

苏联要谋求在核武器方面的优势；陷入越南战争的约翰逊政府全面谋求提升美国的军备质量。于是，美苏双方开始了新一轮的常规军备竞赛和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竞赛。

古巴导弹危机期间，1962年10月27日的赫鲁晓夫信件初步提及了禁止核试验的想法。1963年8月5日，在中、法核武器研发进入关键时刻，即将开始试验时，美、苏积极推进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的签订；1968年7月，《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签订。

3. 争夺中东

美苏也在强化争夺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苏联为强化对埃及的支持和援助，向埃及发送了并不完全可信的情报，据称以色列即将偷袭埃及。埃及对此在边境展开了一系列军备防御措施，以色列亦对此做出反应。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先发制人”，对埃及的十个机场展开了空袭，第三次中东战争开始。在48小时内，以色列空军的打击使得埃及、约旦、叙利亚三国空军瘫痪。此后，以色列陆军占领了加沙地带、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以及戈兰高地。6月10日，以色列正式停火。由于此次战争仅持续了6天，又被称为“六日战争”。

从此以后，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就逐渐固化：第一，巴勒斯坦-以色列矛盾，以色列边界问题；第二，其他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矛盾，主要体现为民间和宗教的仇恨，但在世俗政治事务上并不明显；第三，中东不同阵营国家之间的矛盾，即美、苏作为域外大国所支持的政权之间的矛盾。

二、东方阵营的部分解体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一）中苏分歧的产生与同盟破裂

苏共二十大对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问题、拒绝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导致了中苏之间的矛盾逐渐发酵。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联提出了对中国军事行动的反对，中苏分歧正式公开化。

苏共二十二大上，罗马尼亚代表团激烈地批评了当时与中国关系较好的阿尔巴尼亚，随后中苏关系正式破裂。中苏分歧破裂集中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争论，如“九评苏共”；还体现在苏联撕毁援助中国的合同与催还债务、边境问题与局部武装冲突等。

中苏同盟破裂后，中国的外交战略也从“一边倒”转变为了“两条线”战略。

（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1. “布拉格之春”

由于政治和经济方面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1967年起，捷克斯洛伐克公众的不满情绪迅速滋长，党内斗争也日趋尖锐。1968年，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成为捷共第一书记，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在对内政策上主张改变现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一种反对苏联控制、要求独立自主的倾向。4月初，捷共中央通过了反映上述要求的《行动纲领》，使国内的形势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上层的斗争向基层发展，党内的动荡向社会扩散，出现了一场广泛的政治民主化运动，即“布拉格之春”。

尽管杜布切克等人一再表示，捷克斯洛伐克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维护华约的团结，苏联领导人仍然为其国内形势的发展感到不安，不仅担心捷克斯洛伐克会脱离苏联的战略轨道，更担心它的离心倾向会在东欧国家引起连锁反应。为了阻止这一危险，勃列日涅夫加紧对其施加压力。1968年5月，苏联以防御联邦德国为名要求在捷境的西部驻军；6月，苏联又趁华约举行演习的机会将大量苏军派人捷境的要冲，并且迟迟不肯撤出。

与此同时，苏联要求捷共领导人到莫斯科或基辅进行两党会谈，捷共中央反对在苏联境内举行两党会晤。在此情况下，苏共领导人于7月29日赶到捷境内的小镇切尔纳，同捷共领导人开始了持续4天的会谈。8月3日，杜布切克又与苏联及上述四国领导人在斯洛伐克的首府布拉迪斯拉发进行了会，并发布了一项声明。它一方面强调“支持、巩固与保卫”苏联和东欧各国在革命和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果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国际主义义务”，另一方面又声称与会国要“在平等、尊重主权和民族独立以及领土完整、相互援助和团结的基础上改善全面合作”。此外，苏联还表示愿撤出为参加演习而进人捷境的苏军。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似乎已经缓和。

2. 苏联的入侵

然而，1968年8月20日深夜，正当捷共中央主席团讨论十四大的安排时，苏联拉拢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波兰和匈牙利，出动30万军队向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了入侵，并迅速对捷实行了军事占领。8月21日，捷国民议会决定不对占领军采取任何暴力行动，但是群众却自发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抗。次日，捷共十四大提前召开，选出了以杜布切克为首的中央委员会。8月23日，布拉格举行了全市大罢工。在当时的情况下，勃列日涅夫根本无法在捷直接组成一个亲苏政权，于是改变手法，迫使已被带至莫斯科的杜布切克等人在8月26日签署了《苏捷会谈公报》。按照这一文件，苏联表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完善领导社会的方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制度”的立场表示理解，承诺“暂时进入”捷领土的盟国军队“将不干预”其内政；捷方则声明将“为发展和加强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采取有效措施；双方声称将“绝对履行它们在社会主义国家缔结的多边和双边条约方面承担的一切义务，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防御实力，提高防御性的华沙条约的效力”。

10月16日，苏联又强迫捷政府签署了《苏联军队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协定》，为苏联在捷的长期驻军提供了法律基础。翌年的4月，在苏联的压力下，捷共中央免去了杜布切克的第一书记职务，而由胡萨克接替。

在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其共性在于：第一，当地经济问题是事件的根源，历史遗留问题同样推波助澜；第二，苏联对东欧卫星国的强力控制导致卫星国领导人的独立性丧失，在此过程中苏联自身的资源也被大量损耗。

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无视国际准则、公然出兵干涉一个主权国家内政的行径，暴露了其霸权主义对外政策的本质。这一做法遭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反对，苏联在国际上陷人了空前的孤立。此外，中国、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对苏联这一侵略行为的强烈遣责，进一步表明了东方阵营的部分解体。

三、西方阵营内部矛盾加深

（一）肯尼迪多边核力量计划及其破产

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控制核武器的战略方针发生了变化。美国反对核力量的扩散（proliferation），但支持核力量的分散（spread），美国由此提出在控制权和所有权方面的多边北约核力量。出于西欧各国的财政等原因，这一计划在西欧各国并未顺利进展。

1962年12月21日，美英双方达成了“拿骚协议”：美国同意向英国提供“北极星”导弹（核弹头和核潜艇由英国自己负责），但是，作为条件，英国认可并且同意加人美国的北约多边核力量计划。由此，美国向法国发起了同样的邀请，但戴高乐拒绝了这一邀请，且表示对任何禁止核试验的条约都不感兴趣。

戴高乐的抵制也鼓励了英国国内对拿骚协议的反对，1963年10月，英国政府宣布无意对北约多边核力量计划承担义务。1964年12月20日，美国总统约翰逊要求美国的所有驻外代表不得在多边核力量问题上发挥领导或推动作用。肯尼迪多边核力量计划宣告破产。

（二）法国退出北约一体化机构

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逐渐形成了“堡垒法国”和“全向庇护”的思想。“堡垒法国”指的是只有在法国本土受到攻击时，法国才会使用核力量进行报复；“全向庇护”指的是法国应当准备抵御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和风险。

1965年起，法国开始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法国先后拒绝参加北约的军事演习、宣称将在其领土上恢复对主权的完全行使、收回北约司令部对驻德部队的管辖权、撤出北约一体化司令部、令美军军事机构撤出法国领土等。

（三）欧洲内部矛盾加剧

1. 欧洲共同体内部的冲突

戴高乐政府关于欧洲共同体，具有两个设想：第一，法国应成为欧洲的领导者，欧洲是“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应把美国的“代理人”英国排除在外；第二，由于德国作为战败国欠缺政治上的合法性，故法国需要想办法“驾驭”德国，从而形成以法、德为核心的欧洲共同体，成为与美、苏对立的“第三股势力”。

1961年，戴高乐向欧共体其他五国提出了“欧洲联盟”的建议；2月，欧共体巴黎首脑会议召开，但会上各国间出现了分歧：法国希望建立主权国家之间的联盟，而比利时、荷兰等国则希望建立“超国家实体”。会议最后形成了“富歇计划”，这一计划并未取得任何成果。1964年12月31日，戴高乐在电视讲话中提出“法国要在政治、经济、金融、防务等领域内成为自己的主人”。1965年7月，法国政府宣布暂不参加欧共体会议，造成了“空椅子”危机。

此外，对于英国是否加入欧共体的问题，法国与其他欧共体国家也有分歧。1961年8月，英国麦克米伦政府提交了加入欧共体的申请，并提出了一系列条件，令法国极为反感。1963年1月14日，戴高乐拒绝了英国加入欧共体的请求。1967年11月下旬，法国第二次正式否决了英国加人欧共体的申请。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国，特别是荷兰，对法国的做法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在随后的一年中，它们不仅一再提出英国加入欧共体的问题，还多次试图在共同体的其他政策方面挫败巴黎的企图。

2. 联邦德国的自主对外政策

1969年9月，维利·勃兰特当选联邦德国总理，开始推行“新东方政策”。新东方政策旨在在保持与西方关系的同时改善和东方关系。德国承认战后欧洲现状，改善与苏联关系；承认两个德国并存的局面，通过建立“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关系，加强同民主德国的交往，在欧洲缓和中通过“以接近求转变”的方式实现统一。

德国寻求改善与苏联和波兰的关系。1970年8月，苏德签订《莫斯科条约》，毫不保留地尊重所有欧洲国家在其现有边界内的领土完整，宣布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并不在将来提出此类要求。1970年12月7日，德波签订《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的条约》；当日，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犹太街区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致哀，史称“华沙之跪”，促成了德波历史和解。

四、第三世界的兴起和反美斗争

（一）不结盟运动的形成

不结盟运动的形成，是冷战期间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上寻找自己的定位的体现。1960年十五届联大召开期间，铁托、尼赫鲁、纳赛尔、苏加诺和恩克鲁玛在纽约讨论了召开不结盟运动国家首脑会议的问题。1961年6月，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筹备会议在开罗召开，提出了受邀参加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国家的标准：

* 应当采取了建立在具有不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和平共处以及不结盟基础上的独立政策，或者显示了赞成这一政策的倾向；
* 应当一贯支持民族独立运动；
* 不得是参加在大国冲突背景下缔结的军事同盟的成员；
* 不得是“在大国冲突背景下”缔结的“双边军事协定”或者“区域性条约”的成员；
* 不得在“大国冲突背景下”向“外部大国”提供了“军事基地”。

1961年9月上旬，首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作为正式成员参加的有25个国家，除了南斯拉夫和古巴外，它们都来自亚洲和非洲。作为观察员列席的则是三个拉美国家。会议通过了《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和政府首脑宣言》，它突出表明了与会国强烈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大国政治的立场。

二战之后，民族独立运动的第一根支柱——政治和军事——基本得到了稳固；但第二和第三根支柱，即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经济、贸易、金融独立）以及传播上的话语权，在冷战期间被持久遮盖。不结盟运动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重新聚焦于被美苏冷战、大国博弈所掩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家解放、民族独立运动。

（二）77国集团的形成

发展中国家对经济独立的需求，以及不结盟运动的形成，鼓励了77国集团的形成。1964年6月，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77个发展中国家联合发表了《77个发展中国家联合宣言》。该宣言首次正式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概念，谴责了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对它们进行掠夺和剥削的行为，表达了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建立一种“新的和正义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愿望。

尽管77国集团没有章程、预算和常设机构，但其形成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这表明了亚、非、拉美国家团结的加强，它们已经不满足于在维护民族独立及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合作，进一步发展了在促进民族经济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中的相互支持。因此，这一集团的出现也是第三世界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第二，77国集团的形成表明南北关系进人了一个新阶段。它和20世纪60年代建立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组织一起，为20世纪70年代的南北对话做好了组织上和舆论上的准备。

（三）印支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美国在越南的地位，是一个逐渐浮现的过程：从军事顾问，到海空军介入，再到地面部队全面介入。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向南越派遣了大量军事顾问；肯尼迪政府时期，急剧增加了派往南越的顾问、教官和其他军事人员，在南越展开“特种战争”。但是，美国及其支持下的吴庭艳政权并不能成功地镇压南越人民的斗争。1963年，吴庭艳由于迫害佛教徒，在宗教界和舆论场上失去了一切优势；8月24日，美国国务院向驻越大使馆提出“不会干预军官们发动取代吴庭艳的政变”；11月，吴庭艳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杀。

约翰逊政府上台后，1964年8月，他以美国军舰“马克多斯号”在北部湾遭到越南人民军打击为借口（史称“北部湾事件”），一方面派遣空军对越南北方进行所谓的报复性打击；另一方面又成功地从国会获得授权，同意他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击退针对美国军事力量的一切“武装攻击”。越南战争由此逐渐展开。

从1965年起，中国不仅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了大量的物资，而且派出了它急需的各类武装人员。根据两国达成的协议，从1965年10月到1968年3月，中国前往北越的防空、后勤保障及各类工程等支援部队共达32万余人，其中不少人为了越南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第八讲 美苏关系的第二次缓和与争霸以及第三世界的反霸斗争

2024.4.16 / 2024.4.23 / 2024.4.30

一、中美关系的历史发展

（一）新中国建立前后的中美关系

在二战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定位是建立一个相对稳定而亲美的中国，令中国作为美国在亚洲的支柱，在国际事务中支持美国。美国这一阶段对中国的控制，体现为政治上扶持，经济上通过签订条约来控制经济命脉，文化上在宗教、教育、福利等方面进行渗透。在解放战争期间，美国予以了介入：起初，美国奉行“扶蒋压共”的方针；之后，1945年底到1947年初，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双方矛盾；在国民党大势已去后，美国则奉行在大陆的脱身政策。

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包括：

1. **另起炉灶：**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
2.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首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干净，然后再考虑建交问题；
3. **一边倒：**明确宣布新中国站在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一边。

教授认为，这样的政策是冷战的背景下中国能做出的最好选择。

有关承认新中国的问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了三条标准：事实上控制——至少在大陆部分完全控制，而国民党一旦仍在大陆抵抗则此条标准无法达成；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国际义务——意指需要保留国民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国内人民普遍认同——暗示需要在民主党派中存有美国可以影响甚至控制的政党，走“第三条道路”。

（二）台湾问题

1. 台湾问题的由来及美国对台政策

新中国建立、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因素开始显现：第一是意识形态，即如何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更确切地说，是如何理解中国与苏联、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第二是国家利益，即如何判断美国在亚洲和远东的国家利益，在美国力量不足时维持在亚太的基本势力范围，在美国力量充足时以“门户开放”为名促进对亚太的利益独占；第三是国内政治结构，包括亲台游说力量和军工-科技复合体。

台湾问题的由来可见如下时间线：

* **1949年**
  + **8月17日：**福州解放，开始组织漳厦金战役；
  + **10月25日：**金门战役失利；
  + **12月：**消灭白崇禧部17万人；
* **1950年**
  + **4月15日：**解放舟山；
  + **5月1日：**解放海南岛；
  +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 **6月27日：**第七舰队进驻海峡；
  + **8月11日：**“1951年不打台湾”；
  + **9月：**令第9兵团北上作为入朝作战第二梯队；
  + **9月15日：**仁川登陆，同日下令推迟进攻金门。

2. 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

1953年9月，美国与台湾国民党集团签订了《军事协调谅解协定》，虽然“放蒋出笼”，但提出了中立化——如果发生战争，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指挥，必须得到美国的同意。1954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申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8月11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33 次会议上做《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

8月3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表示要用海空军“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17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公然宣布要以美国第七舰队武装干涉中国内政；19日，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斯图普率领美国海军6艘军舰侵入大陈岛一带海面，还出动飞机160多架次在大陈岛海面上空活动。

1954年9月3日，炮击金门，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开始。11月1日，中国东南沿海炮声再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开始轰炸大陈岛，海军舰艇出击浙江东部海面，一举击沉国民党军队“太平号”驱逐舰。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1955年1月18日，中国陆海空军配合作战，一举攻克江山岛；1月30日，国民党自大陈岛撤离。

3月7日的《人民日报》以社论的形式透露信息，主张召开有关会议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4月23日，周恩来在万隆提议与美国坐下来讨论缓和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远东紧张局势问题。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周恩来

5月12日至20日，周恩来6次与专程来访的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就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进行深入交谈。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全体会议上宣布新的对台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个可能方式，即战争的方式与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以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5月26日，毛泽东与印尼总理会见的时候，进一步提出与美国签订和平条约的主张。7月30日，周恩来进一步宣告，只要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将会继续增长，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与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7月13日，美国通过英国向中国建议举行大使级会谈。周恩来7月13日代表中国政府回文表示同意。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举行。

3.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

1955年春夏之交台海局势缓和以后，中国立即开始加强夺取金门、马祖的作战准备。7月8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讨论夺取金门的作战方案；7月14日毛泽东批准了会议的决定。

在9月10日的厦门会议上，彭德怀提出了夺取金门战役的计划，获中央军委批准。为适应作战需要，1956年春南京军区进行大调整，为直接指挥进攻金门、马祖，专门增设了福建军区。1957年，鹰厦铁路修建完成；同年，美国在台湾部署地对地战术导弹；12月，中美大使会谈中断。1958年春，中共中央军委讨论了解放军空军进驻福建的计划、时机以及可能引起的各种反应（包括美国方面的反应），7月决定空军立即按计划进入福建前沿机场。

6月30日，中国政府公开向美国发出限期恢复大使级谈判的声明，并突出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严重性和中国“完全有能力解放台湾”。8月23日，炮击金门，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开始；8月24日至25日，庄莱德/费尔特的强烈反映；8月25日，艾森豪威尔在白宫会议上提出“不要轻易卷入”。

8月27日，美方公开表示保卫沿海岛屿的必要性；8月28日，美方开始考虑护航的问题。9月2日，杜勒斯与国务院、军方人员讨论台海局势：讨论了使用核武器的必要性；讨论了使用核武器的门槛（两栖进攻；持续炮击；空中轰炸），考虑使用7000~10000吨TNT的空爆弹攻击沿海机场；考虑了国际上的反映。

9月4日，杜勒斯坚持必须协防沿海岛屿以及在必要时使用核武器的立场；同日，杜勒斯发表《新港声明》，美国军队将负责保护金门、马祖，并宣称不承认中国领海12海里的规定。 9月7日，蒋海军副司令黎玉玺及美国顾问，率领2艘运输舰、5艘作战舰和美国的2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驶进金门海域；11时，运输舰进入料罗湾港口，在金门守军炮轰厦门的掩护下，靠岸卸货；14时45分至19时，担任护航的4艘美国军舰侵入金门、厦门的领海线以内活动。

对于美方的行为，中国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向美国政府提出警告。9月3日，毛泽东建议恢复华沙会谈；9月6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欢迎恢复会谈。9月8日上午，国民党的2艘运输舰在美舰的掩护下驶向金门，美舰也侵入中国领海内活动。12时43分，我集中42个炮兵营连同所有的海岸炮兵，突然对料罗湾的蒋军舰艇及金门岛上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第3次大规模炮击。美国军舰撤至料罗湾外12海里处徘徊观望，始终没有向我开炮。

9月13日，杜勒斯对于谈判发出指示：停止台湾海峡地区的敌对行动；讨论缓和紧张局势的问题；释放被扣押的美国人。9月17日，美军开始在金门部署能够发射核弹的203毫米火炮；9月27日，美国空军部长宣布已经做好对大陆实施核打击的准备。

9月17日，中方提出谈判方略：反对美国的停火建议；台湾问题“一揽子”解决。9月30日，杜勒斯发表关于“金马换台澎”的讲话。1958年10月，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缓解。1959年1月9日，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事实上结束。

（三）中美关系的转变

随着世界格局变化与美苏战略转型，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破裂，美国进行战略转型，中美关系也随之向缓和的态势转变。

1969年3月，法国作为了中美的传话通道，即巴黎渠道；7月21日，美国取消对华部分限制；之后一段时间，还陆续开启了巴基斯坦渠道、罗马尼亚渠道、华沙渠道。12月3日，在波兰，斯托塞尔-雷阳展开了接触。

1970年1月8日，美国首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称呼。1971年4月6日，乒乓外交展开；7月9日~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2年2月21日~28日，尼克松访华，期间发布了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水门事件后，中美关系改善陷入停滞。1974年11月~1977年10月：倒联络处方案vs.建交三原则。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访华；12月16日，《中美建交公报》发布。

二、美苏对外战略的新调整

20世纪70年代，国际环境出现了新变化。大国力量对比与相互关系发生进一步变化，“五大力量中心”概念被提出；相互确保毁灭的核恐怖均衡维持；美苏面临各自困难难以继续维持高强度对抗。在这种情况下，美苏都调整了对外战略。

（一）尼克松政府的对外战略调整

尼克松政府意识到了时代正在发生变化：意识形态形势变化；多极均势出现的条件成熟；中苏分裂产生影响。由此，其提出了尼克松主义——伙伴关系、实力、谈判。尼克松政府进行了战略调整，开始改善与西欧、日本的关系，寻求从越南脱身，打开通向北京之路，并从实力地位出发与苏联谈判。

寻求从越南体面脱身的背景是：基于“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已经深陷越南泥潭近十年，美国已经失去了对赢得越南战争的兴趣。为此，美国希望推动“战争越南化”——即令“越南人打越南人”，美国仅提供武器和资金。1973年1月23日，参加巴黎和谈的四方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美国在60天内从越南南方全面撤军。

（二）苏联战略的调整

勃列日涅夫在任时期，其奉行的新战略是，在欧洲进行缓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使用更强硬的手段对东欧各国进行控制。这样的战略旨在改善苏联的国际环境与拓展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样的势力网络，将苏联的军事实力和重工业实力发挥到了极致，但也将苏联推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不归道路。在阿富汗、安哥拉，以及一些拉美国家，苏联与美国似乎发生了“逆位”——即，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成为了在当地扶持傀儡的国家，而美国（乃至后来的中国）成为了引导当地人民反抗苏联的国家。

苏联拓展势力范围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将其经互会的模式推广到全世界，从而通过抽取税务的方式促进苏联本身的经济流转与发展。然而，在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使用军事实力或政治手段扶持傀儡是无法成功的，其结果只能是自身的经济被拖垮。

三、美苏军控谈判

（一）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

1972年5月22日，尼克松访问苏联，美苏莫斯科首脑会晤，由此拉开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 I）的序幕。SALT I经历了在赫尔辛基、维也纳、莫斯科的三次会谈，签订了《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出台了《美苏相互关系原则宣言》。

1973年华盛顿会晤产生了《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核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1974年莫斯科会晤产生了《美苏限制地下核试验条约》《美苏促进经济、工业和技术长期合作协定》《关于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联合声明》。

美苏第二阶段战略武器谈判（SALT II）于1973年11月至1979年6月展开，最后形成了《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美苏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 III）则在1982年6月至1983年12月进行。

（二）欧洲安全

1.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1972年11月22日~1973年6月8日，赫尔辛基会议召开，形成了《赫尔辛基最后建议蓝皮书》。随后，外长会议于1973年7月3日~6日进行；专家会议于1973年9月~1975年7月21日进行，形成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首脑会议于1975年7月31日~8月1日进行，形成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意义是其强调了在欧洲范围内不诉诸武力和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争论包括：欧洲边境现状与军事信任问题、双方人员和情报交流、关于经济和科技相互关系等。

2. 中欧裁军谈判

1968年6月25日，美国提出中欧裁军建议。1973年1月31日至1974年6月8日，召开了预备会议。会议的主要分歧是均衡原则（双方裁军至同一水平）与对等原则（双方等量裁军）的分歧。

（三）第二次缓和的终结

1966年~1972年，苏联支持印度发动第三次印巴战争；1978年，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签订，苏联进驻金兰湾，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1975年，苏联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内战中获胜；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些事件中所体现的苏联的扩张政策和南下战略，导致了苏联与美国的第二次缓和的终结。

四、世界其他地区局势的变化

这段时间，欧共体的发展、西欧各国独立自主地位的提升（由于黄金库存的不足，布雷顿森林体系于20世纪70年代崩溃，取而代之的是牙买加体系），以及日本自主倾向的加强，都在国际关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反对霸权斗争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仍在进行，具体体现为第四次中东战争（赎罪日战争）与戴维营协议、巴拿马人民捍卫运河主权的斗争、第三世界在联合国的斗争、中东石油斗争、反对海洋霸权的斗争等。

第九讲 美苏关系的再度紧张与第三次缓和

2024.4.30

一、美苏关系再度紧张

（一）里根“重振国威”和美苏僵硬对抗

卡特政府后期进行了战略转型：其注重人权外交，提倡美国外交的道德感；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政府提出了卡特主义，卡特于1980年1月23日提出“任何外部势力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的尝试都被视为是对美国切身利益的一种进攻，美国将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使用军事力量来打退这种进攻”。

随着里根上台，里根政府采取了新战略：一方面奉行“实力加谈判”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谋求重振国威，以实力求和平。这具体表现为里根主义，即以低烈度战争来打击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制定“星球大战计划”，谋求战略优势，打破美苏核均衡，利用美国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挑起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构筑美国的高技术优势；推进和加强美国在西方世界中的领导地位。

里根政府的战略调整还体现在力求从“1.5场战争”变为“两个战争”，重启军备竞赛，提出了“600艘海军舰只建造计划”和“总统战略防御构想”。

（二）美国和苏联在热点地区的争夺

**亚太地区：**1982年9月1日，大韩航空007号班机被苏联击落事件；苏联驻军的金兰湾与美国驻军的苏比克海军基地、克拉克空军基地。

**中东地区：**第五次中东战争（黎巴嫩战争），以色列入侵黎巴嫩；1984年后苏联的主动进攻策略；黄金峡谷计划；油轮护航计划。

**拉美地区：**1973年，美国支持皮诺切特政变，推翻智利阿连德政府；1983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

**非洲：**入侵非洲之角；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南也门与索马里、肯尼亚、苏丹冲突。

二、美苏关系的第三次缓和

（一）苏联战略的调整

1982年至1985年，苏联历经了三任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三者先后去世，频繁的人事变化凸显了当时苏联老人政治的弊端。与此同时，苏联经济状况持续恶化：1985年，苏联的GDP为1.8万亿美元，美国为3.9万亿美元；苏联的人均收入为5400美元，美国为13000美元。于是，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提出了苏联战略的转型，包括战略发展重心的调整以及和平发展战略的提出。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了外交“新思维”：世界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体；当前核战争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利益；资本主义仍然具有发展前途和富有生命力。

“新思维”的目的是摆脱军备竞赛、开展和平攻势。由此，苏联开始调整对外政策：以裁军问题为切入点，开始改善苏美关系；主动缓和与西欧国家关系；收缩战线，改善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修正对东欧的政策，稳定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转变对中国的态度，谋求苏中关系正常化。

（二）第三次缓和的促成

1985年11月，美苏首脑日内瓦会晤。随后，又在雷克雅未克、华盛顿、莫斯科进行了三次会晤，美苏关系急速缓和。1987年12月，《中程导弹条约》签订，这是第一个真正裁减核军备的条约，苏联通过销毁已有的中程导弹换取美国取消部署中程导弹的计划。

1985年6月，经互会致函欧共体，重启了东西方经济交流。之后，随着汉城奥运会举办、欧洲常规裁军谈判取得进展、地区冲突局势缓和，东西方关系实现了第三次缓和。

三、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增强

（一）国际关系中的新因素

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知识经济的出现，以及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密切结合，促成了新的国际力量对比；跨国公司高速发展，数量迅速增加，规模迅速扩大，影响迅速增强；国际组织方面也有发展变化，体现为非政府国际组织的高速发展。

同时，南北对话取得了有限成果，南南合作持续增强。经济合作开始成为合作焦点，南南一体化开始推进。

（二）中国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地位的提升

随着在中苏关系的主要问题上苏联做出了比较重要的政策调整，中苏关系重新正常化。与此同时，中美关系持续发展，如美国对台军售形成初步解决方案（第三个联合公报），双方加强了经贸合作（向美国开放中国的巨大市场与劳动力），美国强化了与中国的技术和情报合作等。

（三）西欧联合运动全面加强以及日本积极谋求独立发挥作用

西欧方面，欧共体成员持续扩大，经济合作持续加强，政治合作取得显著进展，共同防务政策领域合作重新启动。

日本方面，开始再次谋求政治大国地位，谋求更加均衡的日美关系，依托电子高科技产业尝试构建更加对等的经贸关系；改进对苏联关系，积极促进对华友好关系；改善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在全球热点地区推进“热点外交”。

第十讲 苏联的动荡、东欧的剧变与冷战的结束

2024.4.30 / 2024.5.7

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陷入困境，以及最终导向苏联的解体

苏联国内改革的失败，主要分为三部分：经济改革受阻、政治改革失控、民族政策错乱。三部分先后联结：当经济改革受阻时，就认为是政治上的阻力，于是开始政治改革；当政治改革失控时，民族政策也随之改变而错乱。

同时，对东欧政策的混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苏联承认了这方面的错误但不知道怎么改进，从而从另一个方向继续了大国沙文主义。

（一）戈尔巴乔夫改革

1. 戈尔巴乔夫上台

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安德罗波夫继任苏共最高领导人。在安德罗波夫任职短短的一年零二个月中，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而戈尔巴乔夫作为安德罗波夫最器重的“农业专家”，是安德罗波夫进行改革的最坚决的支持者和执行者，并使苏联的经济情况大有起色，这就为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最高领导者铺平了道路。

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病逝，由契尔年科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被宣布为第二号人物，成为政治局的核心成员。而当时70多岁的契尔年科体弱多病，他接任总书记显然是个过渡人物。此时戈尔巴乔夫主管农业、经济、教育、意识形态和外交事务。

1985年3月，契尔年科病逝。在葛罗米柯等人的支持下，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5月11日在苏共中央非常全会上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国防会议主席。他实际上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

2. 苏联的困境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衷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经济上，经济增长缓慢，居民生活水平持续下降；政治上，领导层老化，思想僵化保守，特权问题严重；国际上，苏联处于孤立与被动之中。

苏联的经济困境是上述困境中最主要的。当时的苏联，资金、外汇大量损失、得不偿失，民风进一步涣散，出现信用危机。8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大跌，1986~1987年，石油外汇收入减少三分之一，政府黄金储备从1985年的2500吨，降至1991年的240吨。重大事故连接不断：列宁那坎市大地震；“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沉没，200多名旅客丧生；核潜艇沉没，全体官兵遇难；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重大事故，殃及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波兰等，危害人口达10万之众，直接间接损失达1000亿美元。国库空虚、大发纸币、预算出现黑洞、隐性通膨严重、官方统计虚伪，1985年苏财政赤字已达170~180亿卢布。1986年，形势更加恶化，预算已无法完成，赤字已超过500亿卢布。然而社会上却游荡着巨额卢布，构成“雪崩”之兆。

由此，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早期尝试就是经济改革先行，这一方针于1985年4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并于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上公开并付诸实践。随后的改革进程与重点有所转变，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上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提出在完成经济改革之前，先完成政治改革。在这一背景下，多党制呼声开始出现。苏共党内的“三人组”也初步成型：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列宁格勒市委书记索布恰克。

戈尔巴乔夫改革有三大运动：第一，加速发展机械行业，赶超美国；第二，“学校电脑化”，推翻前苏联以“重新塑造人的灵魂”为重点的传统教育，造就类似西方社会中的“白领阶层”，但由于当时的前苏联还缺乏大规模生产电脑的条件，使这一运动一开始就没有物质基础而化为泡影；第三，反酗酒运动，由于运动本身本末倒置，加之社会、官员腐败，使酗酒越反越烈。

（二）叶利钦反对派

1.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联盟的建立及其破裂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任苏共总书记，面临国情积重难返，立志改革，急需“改革先锋”与人才，叶利钦恰好成为急切寻将的戈尔巴乔夫最佳人选。1985年4月，叶利钦调任莫斯科，任建筑部长，从此走进全国性政治家的行列。

1985的7月1日，叶利钦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跻身于前20位苏联实权人物之中；1985年12月23日，戈氏召见叶，当面指派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第二天获苏共中央全会通过；1986年2月，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叶利钦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至此跨上权力高峰。

1987年10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叶利钦对党中央发起突然袭击，公开谴责戈尔巴乔夫“改革无成效”，指责苏共第二把手利加乔夫作风官僚等，意在夺取最高权力职位。但这次叶利钦惨败，被逐出政治局，受公开批判，撤去高职，安排作建委第一副主任（正部级）。戈-叶联盟就此破裂。

1989年3月26日，苏联举行人民代表选举，叶利钦违背苏共中央的决定，擅自决定在莫斯科参选并以占选区89.44％的压倒多数选票击败苏共在当地推荐的正式候选人（利哈乔夫汽车厂总经理布拉科夫），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

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抓住竞选机遇，扯下最后的面具，公开退党，申明反苏共、反社会主义，以60％以上的选票优势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登上权力顶峰。

2. 叶利钦的“三把火”

叶利钦在进入苏共中央后，烧起了“三把火”：

1. 大声疾呼“反特权”，痛斥前苏联社会的等级制，宣布取消特权，争取人心；
2. 公开揭露官场腐败，指责官僚的“厚颜无耻”，深得下层群众和广大知识分子的赞赏；
3. 果断冲击官僚体制，实行干部换血。他当莫斯科市委书记第二天，指令老市长立即退休，接着撤换市警察局长，克格勃主席、报社主编等，一年内莫斯科市33个区委书记撤换了23个，轰动前苏联社会、群众欣喜，官员胆战心惊。

（当权者在）80年代末期抛下人民不管，导致人们甚至得不到最起码的服务和商品，人们没有糖、肉、盐、火柴等等。……毫无疑问，正是他们的政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10年前，政治投机者控制了联邦会议和政府的关键席位。高官们为了迎合寡头而不惜损害俄罗斯的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把国家财产挥霍殆尽。腐败是他们的进行政治和经济竞争的手段。这些人年复一年制订的预算既不平衡，也不负责任，导致我们负债累累，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成倍地下降。

——弗拉基米尔·普京，2007.11.21

（三）苏联解体

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非常）人代会正式取消了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款，决定实施总统制和多党制。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召开，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最终目标，开始推行政治上的多党制、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经济上的全面激进私有化方案。

1. 苏联内部的分裂势力与离心主义倾向

1990年3月10日，立陶宛率先宣布独立，波罗的海国家率先跟进。1990年底，苏联第四次（非常）人代会决定起草新联盟条约；1991年3月，初步公民投票；1991年8月14日，新联盟条约文本公布。

2. 八一九事件

1991年8月19日，苏联“保守力量”为挽救联盟，做出了最后尝试，即八一九事件。其宣布由副总统亚纳耶夫即日起代行总统职权，并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定在部分地区实施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

8月19日中午，叶利钦发布《告俄罗斯公民书》，进行了一次强烈反扑；8月20日，叶利钦宣布接管俄罗斯境内全部苏军；8月21日，戈尔巴乔夫宣布“重新控制局势”；8月22日，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政变结束。

3. 红旗落地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并要求苏共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宣布苏共为非法，取缔其组织，禁止活动。

同日，乌克兰宣布独立。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撇开戈尔巴乔夫，在明斯克签署《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12月21日，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的11个国家领导人参与了阿拉木图会议，发布了《阿拉木图宣言》《关于武装力量的议定书》，通知戈尔巴乔夫“苏联已经不复存在，苏联总统职务的设置同时取消”。

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辞去总统职务。当晚7时38分，戈尔巴乔夫向叶利钦转交包括核按钮在内的权力象征。

4. 苏联解体的原因

**“斯大林模式”的彻底失败：**教条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理解框架下的马列主义；指令性计划经济体系的致命缺陷；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引发的既得利益集团与特权问题；军备竞赛取得的“成功”没有“外溢”到民用领域。

**作为直接导火线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没有真正了解苏联的具体国情；改革的指导思想本身有巨大的缺陷，激发了长期积累的矛盾，却没有相应的解决方案；将改革成功的最重要的筹码完全寄托在西方国家的善意和援助之上。

二、东欧剧变

作为政治地理概念的东欧是欧洲中部和巴尔干的部分欧洲国家，包括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

（一）东欧各国的剧变

1. 波兰团结工会

1980年9月，团结工会成立。1989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十届十中全会通过“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决议。1989年2月6日~4月5日，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举行圆桌会议，达成团结工会合法化、实行总统制、增设参议院的协议。6月4日，全国大选，波兰团结工会获得161席，在参议院获得100席中的99席。7月9~11日，布什访问波兰。

7月1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雅鲁泽尔斯基当选为波兰总统（1票优势）；8月24日，团结工会的马佐维耶茨基当选为总理；9月12日，议会通过新政府名单，团结工人党占据23人中的12人；12月底，波兰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删除波兰社会主义国家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波兰占有领导地位的条文，将波兰改名为波兰共和国。

1990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9月，雅鲁泽尔斯基辞职；12月9日，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当选为波兰总统。

2. 匈牙利围绕重评1956年事件展开的变革

1988年3月15日，布达佩斯发生游行；11月22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召开。1989年2月10日~11日，匈牙利党中央全会通过了实行“多党制”的决议，重新评价纳吉；6月13日到9月18日，三方圆桌会议；7月11日~13日，布什访问匈牙利，宣布援助匈牙利的七点方案；10月6日~10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为社会党；10月18日，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

1990年3~4月，匈牙利反对派在议会选举中获胜。

3. 捷克斯洛伐克十一月政治风暴

1989年8月21日和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大规模游行示威。11月17日，布拉格大学生集会；11月24日和26日，乌尔班内克当选总书记；12月28日，杜布切克当选联邦议会主席。1990年3月29日和4月20日，取消国名中的“社会主义”一词。

1991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政府推出激进的经济改革措施。1992年6月20日，同意捷克和斯洛伐克一分为二；11月25日，联邦议会以一票优势通过《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终止法》。1993年1月1日，捷克与斯洛伐克正式分裂。

在以上国家发生剧变后，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也被先后推翻，剧变程度也相较以上国家更激烈。在东欧剧变之后，剧变的国家奉行同苏联拉开距离、向西方靠拢的政策。

（二）柏林墙的倒塌和德国的统一

受到匈牙利事件的冲击，东德出现了借助匈牙利边界的大规模外逃事件；加之戈尔巴乔夫对于东德反对者的支持，1989年11月，柏林墙关卡被冲破。11月9日，两德边境重新正式开放。

1989年11月9日至1990年3月18日是德国统一的筹划和准备阶段。1989年12月7日和1990年1月28日，两德圆桌会议召开。3月18日，开始选举具有“民主合法性”的德国政府。

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国大选结束到7月1日，两德的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条约正式生效。4月12日，民主德国大联合政府建立；5月18日《货币-经济-社会联盟条约》签订；7月1日，东德马克和西德马克的货币兑换开放。

1990年5月5日到9月12日，先后召了开4次会议，形成了《关于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处理了德国统一后与军事联盟的关系问题、统一后的德国与波兰的边界问题、结束四大国在两个德国的“权利和责任”问题。

1990年7月1日到10月3日是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进程。7月22日，人民议院27次会议；8月31日，《统一条约》签订；10月3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国名、国旗、国歌不变，首都定为柏林。

第十一讲 美国构建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努力

2024.5.7 / 2024.5.14

一、美国关于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构想

（一）“世界新秩序”

1. 世界新秩序的提出

苏联解体导致单极体系的出现，国际格局出现变化。布什谋求建立世界新秩序，“当旧的模式和既定事物在我们周围崩溃时，我们将按照自己的价值和理想建立新的国际体系”，而克林顿也部分继承了布什的主张。由此，美国方面提出了所谓“世界新秩序”。

2. 世界新秩序的内涵

* 建立美国对世界的领导；
* 调整同盟体系和建立新的安全机制；
* 扩大民主和民主共同体；
* 实行美国领导下的大国合作和多边主义。

3. 布什的世界新秩序

经过1990年8月23日缅因州总统休假地的酝酿、9月12日国会年会议、1991年1月29日国情咨文、1991年4月13日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的讲话，1991年8月总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绪言《世界新秩序》正式形成。布什政府由此正式提出了世界新秩序。其建构世界新秩序的政策主要包括：

* **安全与防务战略的调整：**全球威慑，应急反应。注重战略威慑力量和防御、前沿军事存在、快速反应能力、改变常规力量。强调合法政府控制，直接要求美国进行军事干涉，认为军事干涉有助于改善局势，且不是为了巩固一个亲美政权。
* **外交战略调整：**建立美国为领导的“集体参与”的伙伴关系；把在全球促进民主与人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突出军备控制和制止毁灭性武器扩散的重要性，加强军备控制机制；利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建立美国领导下的集体安全机制，强制干预国际事务。
* 经济战略的调整。

（二）克林顿政府的参与（engagement）和扩展（enlargement）战略

1993年9月21日，莱克在霍普金斯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演说，提出要加强由主要市场民主国家组成的大家庭；在具有特别意义和机会的国家，促进民主，巩固市场经济；必须反对敌视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国家；促进人道主义国际援助。由此，扩展战略正式提出。

1994年7月，总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了三大目标：加强安全、促进繁荣、推进民主。其基本原则是：必须充当世界领导；预防性外交；选择性参与；实力与外交；必须维护和加强大国合作关系；使全球和地区性合作机构适应新情况并恢复活力。

* 加强安全
  + 灵活地有选择地参与的军事战略
  + 新时期的同盟战略与整体的地区安全战略
  + 参加和平行动的指导方针
* 促进繁荣
  + 战略贸易理论与国家出口战略
  + 倡导自由贸易体制
  + 公平贸易口号下的单方强制手段
* 推进民主
  + 民主和平论与人权政策的提出
  + 支持俄罗斯民主改革进程，巩固民主成果
  + 西半球民主共同体与对海地、古巴的制裁
  + 海地恢复民主行动

新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国要关注核心目标与战略优先选择，发挥美国的领导作用，注重美国面临的威胁。美国对此的选择是塑造——在和平时期将世界塑造为利于美国的格局、准备——维持工业制造业大国地位以应对他国、反应。

（三）北约的扩张

面对苏联解体、华约解散的客观情况，基于美国减少成本的需求和内部成员的其他需求，北约面临着一个重要选择：是逐渐消退乃至最终解散，还是继续强化？对此，北约做出了调整，即联盟新战略概念——第一，从军事同盟转型为政治-军事同盟；第二，进行防区外行动，尤其是在亚太地区，企图从主要关注北大西洋地区的次区域性军事同盟转变为全球性军事同盟。

华约解散后，原苏东集团国家向西方寻求着新的安全保障，并期望着这一保障通过书面条约的形式予以确定，这给了北约东扩以机会。1994年，北约推出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开始了东扩进程；1999年，捷克、匈牙利、波兰正式进入北约，北约的东扩正式开始。

二、“超越遏制”与美俄短暂的蜜月期

（一）超越遏制战略

1989年5月12日，布什在德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大学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超越遏制”；199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超越遏制，争取把苏联作为一个建设性伙伴纳入国际体系”。超越遏制战略的基本内容是：重新修订对苏战略目标，“苏联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建立开放、统一和自由的欧洲；美国在经济、外交和军事上保持强大是推行超越遏制战略的基础。

美国提出的超越遏制战略期望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世界接轨，但实际上是令苏联在涉及本国重大利益的事务上让步，而这种让步是非对称的。

（二）布什政府对原苏联-独联体-俄罗斯的战略调整

1. 第一阶段美苏合作伙伴关系的形成

老布什政府提出了改善美苏关系的五条标准：

* 军事上削减苏联军事力量，首先是驻欧常规力量；
* 要求苏联明确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支持东欧自决；
* 结束地区冲突，停止对尼加拉瓜、阿富汗等亲苏政权的支持与援助；
* 推动苏联实现持久的政治多元化和尊重人权；
* 在扫毒与环境等全球问题上合作。

1989年9月21日~25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美国，就军控问题作出巨大让步。1989年12月2日~3日，美苏首脑在马耳他沿海“高尔基”客轮上会晤，美国承诺不武力干涉东欧，承诺1990年完成削减战略核武器50％的建议。布什提出了三点建议——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督促苏联完成新移民法；支持苏联作为GATT观察员；扩大美苏技术经济的合作。会晤后，戈尔巴乔夫表示“冷战时代已经彻底过去，它已经让位于新时代”。

1990年5月31日~6月3日，美苏首脑于华盛顿会谈，涉及了军控协议、广泛交流的协定、首脑会晤正常化等议题。1990年9月9日，美苏首脑于赫尔辛基会谈，联合应对伊拉克问题。

1991年5月，美国提出哈佛计划，具体体现为《希望协定》的签订，其提出“使苏联在真正民主化和加入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的基础上坚定地向市场经济过渡”。政治进程是：1991年夏末签订联盟条约，秋季签订经济联盟协定；1992年春通过苏联新宪法，夏通过举行自由多党选举组成联盟立法机关。经济改革进程是：1991~1993年，私有化阶段；1994~1997年，进行经济结构改革。1991年6月6日，美国提出的援助条件具体化，包括：开始建立市场经济；向自由选举和法制社会迈进；彻底放弃对那些“追求对内镇压对外颠覆活动的”政权的支持；通过同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的谈判给予他们所要求的自治权；大量削减防务开支。

1991年7月30日~8月1日，美苏首脑于莫斯科会晤，双方达成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I）。

2. 第二阶段推动苏联解体及对独联体国家继续“超越遏制”

推动苏联改革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美国的既定方针，但美国并没有预期到苏联的解体，即没有预料到苏联政治精英对当时的苏联已经缺乏控制。因此，为维持局势，在苏联解体的前夕，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提出了五项原则：

* 苏联人民和平民主自决；
* 尊重现有边界；
* 美国支持民主与法治，支持通过有秩序的民主进程进行和平演变；
* 必须保护人权；
* 应尊重国际法和国际义务。

当然，这些原则的提出并没能防止苏联的解体。苏联解体后，美国开始调整对俄罗斯的关系，包括推动原苏东国家对自身变革的接受、对俄罗斯经济援助、军控谈判等。

三、海湾战争

伊拉克在两伊战争（1980~1988）后经济状况恶化，外债高达8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为亏欠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伊拉克指责科威特过度生产石油，导致油价下跌，进一步损害了伊拉克的经济利益；认为科威特历史上是伊拉克的一部分，主张对科威特拥有主权。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突然入侵并迅速占领了科威特，海湾战争爆发。国际社会迅速反应，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要求伊拉克撤军并对其实施经济制裁；伊拉克拒绝撤军，安理会于是授权使用武力驱逐伊拉克军队。1990年8月至1991年1月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包括英国、法国、沙特阿拉伯等）在沙特阿拉伯集结，进行“沙漠盾牌行动”；1991年1月17日，多国部队发起了大规模空袭行动，代号“沙漠风暴”，打击伊拉克军事设施和基础设施。

1991年2月28日，战争结束，伊拉克接受停火协议，撤出科威特，海湾战争结束。

第十二讲 美国构建“世界新秩序”努力面临的挑战

2024.5.14 / 2024.5.21

一、美俄关系的变化

（一）美俄蜜月期的结束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激进过渡的过程中急需援助。然而，美国未能及时兑现承诺，其原因包括孤立主义与消费“冷战红利”的需求、美国自身经济的困难、可提供的援助与实际需求之间的差距、对俄罗斯的战略警惕等。

美国承诺的破灭，使得意识形态之外的结构性地缘政治矛盾凸显，美俄的蜜月期随之结束。

（二）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

美俄蜜月期无望后，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开始调整。叶利钦重新开始“双头鹰”政策，同时在西方和东方寻求战略突破；中、俄在战略上重新接近，于1996年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但此时的接近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面对美国而采取的象征意义上的接近，直到金砖国家（BRIC）形成，这种接近才从象征走向了实质；俄罗斯国力开始重新强化，再次在全球重新拓展影响力。

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明确否定态度，对北约扩展进入传统斯拉夫地缘政治区域（主要指南斯拉夫地区）表示了强烈不满，除非其本身能够成为北约成员。在接近北约未果后，俄罗斯开始采取用欧洲安全体系取代北约的基本构想；然而，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以区域安全机制取代军事同盟是更先进、更利于和平的，但欧洲国家更加忌惮俄罗斯的实力，因此这一构想付诸实践并不顺利。

二、南斯拉夫内战

（一）南斯拉夫解体

南斯拉夫是一个由多个民族和宗教团体组成的联邦，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波斯尼亚克人（穆斯林）、马其顿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等。1980年南斯拉夫领导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去世后，联邦政府的控制力减弱，共和国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20世纪80年代，南斯拉夫经济陷入困境，高通胀、失业率上升和外债压力增加，各共和国之间对资源分配的不满加剧。

当时，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政府面对经济问题，试图利用民族主义来巩固权力、攫取政治资源，他开始宣扬大塞尔维亚主义。面对以上诸多矛盾，南斯拉夫解体已不可避免。

1991年6月，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宣布独立，引发了与南斯拉夫人民军的冲突，南斯拉夫解体进程开始。斯洛文尼亚战争（也称十日战争）很快结束，但克罗地亚战争持续多年。

（二）波黑战争与科索沃战争

1992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宣布独立，导致多方冲突，包括波斯尼亚的塞族、克族和波斯尼亚克人（穆族）之间的战争。欧盟与美国随即介入，通过1995年的《代顿协议》结束了波斯尼亚战争。

科索沃地区长期以来存在阿尔巴尼亚族和塞尔维亚族之间的紧张关系。1990年代中期，科索沃阿族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成立了科索沃解放军，开始进行分裂行动。北约与美国偏袒性地介入，压制了南斯拉夫当局对科索沃分离势力的合理打击，这是北约首次公开介入主权国家内部冲突。

三、在第三世界地区遇到的挑战

（一）非洲与拉丁美洲的挑战

冷战结束之后，非洲的族群对立和冲突开始高发。冷战时期，美苏双方在非洲扶持代理人，接管当地的族群事务，进行低烈度对抗；然而，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无力在非洲继续代理人战争，美国也撤出了非洲，但留下了当地混乱的局势以及大批量的武器。索马里危机、卢旺达人道主义危机都是其结果。

1991年，海地的民选政府被军人推翻，成立了军政府。1994年，美国前总统卡特前去进行和平斡旋，劝阻海地军政府接受国际社会干涉，迎回海地前总统；海地军政府接受后，美国直接军事介入海地局势，予以暂时接管，和平解决了海地动乱。

（二）亚洲的核问题

冷战之后，亚洲的核问题依然存在且逐渐严峻。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竞争性核试验源于两国历来的对立关系，以及印度本身国防政策、外交政策、对外战略的不稳定性；美国基于遏制中国考虑而放任印度发展核武器的方针也是一个重要推手。

朝鲜核问题的背景是苏联解体导致的朝鲜安全、经济失去保障，尤其是经济失去保障导致的饥荒（“苦难行军”）。这导致当时的朝鲜对外部威胁特别敏感，其对核武器的研发、实验进入快车道。对于朝鲜核问题的解决，存在两种路径：一种路径是以美国为代表，企图推动的“朝鲜无核化”；另一种路径是以中国为代表，希望推动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后者的诉求在于确保驻韩美军不部署核武器，从而回应朝鲜乃至于本国的安全关切。近年来，朝鲜核问题的讨论逐渐式微，这可能是朝鲜的核力量已被默示承认导致的。

伊朗、伊拉克核问题合称两伊核问题，也有其深刻渊源。伊朗的核武器研发基于巴列维时期美国为其援助的核能开发项目；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美伊关系急转直下，伊朗转而自主研发为主，期间也受到了美国等国的渗透与攻击；冷战后，伊朗转向与俄罗斯合作开发核能。为了制衡伊朗、加强自身在中东的地位，伊拉克的核计划于20世纪70年代肇始，其向法国购买了核反应堆，但该核反应堆随后被以色列空军炸毁；20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对伊拉克进行了举步维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查，这轮核查于90年代末和平地完成，但对伊拉克持有核武器的疑虑仍为今后美国布什政府挑起伊拉克战争埋下了伏笔。

第十三讲 欧洲和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

2024.5.21

一、欧盟与欧洲的发展

（一）欧盟的建立与初步发展

1991年的马斯特里赫特会议在欧洲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方面，它将欧共体转变成了欧洲联盟；另一方面，它在欧盟内部建立了三个支柱的结构——共同体条约、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司法与国内事务。这两个变化都是革命性的，不仅反映了欧共体内在的需要，而且体现了冷战结束前后欧洲发生的剧烈变革为欧共体带来的机会和造成的挑战。

冷战结束后，东欧各国加入西欧的诉求也日益增长，其不但源于安全需求，即对苏联（俄罗斯）的威胁的畏惧，而且经济需求在其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基于这一情况，欧共体内部以英国为代表的成员国提出“扩员”路线，以法国为代表的成员国则担心扩员将削弱共同体，故提出“深化”路线，两个路线在一系列会议上针锋相对。

1992年2月7日，欧共体12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正式签署了《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马约）。在欧共体各国完成批准手续以后，它于1993年11月1日起正式生效，欧盟因而正式诞生。《欧洲联盟条约》建立了经济与货币联盟，发行了共同的货币即欧元；强化了司法与民政事务合作，确认了欧盟立法对成员国立法具有指导作用；加强了外交和安全事务领域的合作。

欧盟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注重加强合作的深度与广度：扩大政治合作的深度，覆盖防务与军事事务；共同立场与联合行动作为新的政策工具；强化委员会权限。还注重制度化、程序化和规章化：明确机构职能的法律条文；构建更加系统和科学的决策程序；提出明确的约束性义务。然而，欧盟这一“超国家机构”与国家主权间的张力从未消失，其政策面临着执行与落实的实质性挑战。

（二）欧盟的扩大与《阿姆斯特丹条约》

《欧洲联盟条约》完成了欧盟成员国对“深化”的诉求，而“扩员”的诉求则亟需被响应。《阿姆斯特丹条约》回应了这一诉求，实现了欧盟成员的扩大，成立了货币联盟，强化了欧盟的“三支柱”。

“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也在这一时期提出。然而，欧盟的防务能力与信心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在这一背景下，1999年6月，科隆首脑会议召开，主要解决了欧盟防务的制度框架问题。12月，赫尔辛基首脑会议召开，着重解决提高欧洲军事能力的问题，并就“重要目标”达成了协议；当然，与会的首脑们承认，这一目标实际上超出了当时欧盟国家的能力；但是，他们又相信，只要各国能够实施必要的军事改革，这一目标还是可以实现的。

二、东盟与东亚地区主义

（一）东盟的发展

东南亚国家联盟即东盟成立于1967年，初始成员国包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东盟在冷战时期奉行不结盟主义与中立主义，但受限于冷战的两极格局而未能取得显著成果。

冷战结束后，东盟致力于扩大成员范围，先后吸收了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加上1984年吸收的文莱，东盟成员国已达十国；设立了东盟共同体目标，通过了《建立东南亚十国共同体设想的声明》，宣称要在东南亚“建立一个较为强大和更加具有内聚力的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应该在21世纪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精神实体”；深化经济合作，创设东盟自贸区；推进地区稳定与和平。

（二）东盟地区论坛与“10+3”对话机制的建立

冷战期间，东盟主要通过不结盟主义和中立主义将自身排除于东西方两大阵营外。冷战后，东盟则试图在大国之间发挥一种有助于地区稳定的桥梁作用。1994年7月，东盟成员国与中、日、韩、美、俄、澳大利亚、欧盟等共18方外长或高官参加了首次东盟地区论坛会议，即曼谷会议；1995年8月，第二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召开，即文莱会议。

除了东盟地区论坛外，东盟还和东北亚的三个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发展了特殊的“10+3”“10+1”对话机制，发展东亚合作和促进东亚安全。

第十四讲 9·11恐怖袭击与布什主义

2024.5.21 / 2024.6.2

一、9·11恐怖主义袭击及其影响

（一）9·11恐怖主义袭击

9·11恐怖袭击是美国本土历史上第三次、1941年之后第一次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了巨大的有形损失和无形损失。在9·11袭击中丧生者约为3000人，造成的财产损失更是高达千亿美元；同时，9·11袭击正是发生于美国经济开始滑坡的时候，通过对航空和旅游业的严重损害以及对公众的消费信心的沉重打击导致了经济的进一步下跌——从9·11到当年的圣诞节间的三个多月中，60万以上的工作岗位遭到裁减，这一数字超出了1993~1997年间的裁减总数，比2000年的全年裁减总数只少1.1万个。

恐怖主义的应对策略引发了广泛关注，恐怖主义造成的损失与心理冲击影响了美国对外战略与政策的制定。9·11恐怖袭击带给了美国普遍的不安全感，导致了美国国内政治与安全领域的“保守化”。在对外战略与政策制定方面，9·11恐怖袭击有限地改善了美国的国际处境，但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布什主义出台。

（二）布什主义

布什主义的核心即是“政权更迭、先发制人（预防性战争）、单边主义、美国至上”。

* **政权更迭：**通过政治军事手段，从外部推动一个国家的政权改变，且往往不仅是人事改变，更多是制度改变；
* **先发制人：**战术上“先发制人”式予以打击，战略上积极推动预防性战争；
* **单边主义：**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执行单边行动；
* **美国至上：**一切利益与安全关切向美国看齐，必要时可以牺牲他国的安全关切。

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旨在构建新的战略认知框架与决策过程，以美国及其核心盟友为中心。其基于三个核心假设：第一，冷战后的世界仍然是危险的；第二，美国有足够的力量单独行动；第三，美国必须展现足够坚定的意志。

小布什政府对国际机制的蔑视与拒绝，使其之前积累的国际社会的同情并未持续多久。小布什政府拒绝批准全面核禁止条约，以保留进一步发展和优化核武器的权利；退出反导条约，拒绝批准罗马规约。

二、“先发制人”与伊拉克战争

“先发制人”与预防性战争在法理上存在着困境与争论：如何界定风险、如何实施行动、如何控制后果，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根本原因有两点：第一是结构性原因，即中东的战略意义；第二是小布什政府的特殊驱动，聚焦于反恐战争及其实践。

2003年3月17日晚（美国东部时间），小布什向萨达姆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和他的儿子在48小时之内离开伊拉克。在最后通牒到期之后，3月19日晚，小布什在白宫发表讲话，正式对伊宣战。4月9日，依靠先进军事技术的美军则占领了巴格达，结束了萨达姆长达24年的统治。市中心的萨达姆塑像也被伊拉克人和美国士兵推倒。

但是，事实证明，巴格达的被占乃至萨达姆的被俘，都并不意味美军已经真正赢得了伊拉克战争。伊拉克局势开始“越南化”，缺乏合法性的对外干涉带来的负面后果开始浮现。美国一开始挪用了二战后对日本和德国的策略，在伊拉克进行“国家重建”；然而，伊拉克的局势迅速升级，各地的抵抗愈演愈烈，美国不仅无法继续撤离，而且必须不断往伊拉克增兵以维持治安。

对美国而言，美国的国家安全资源在冷战后难得地释放，但不久后就被投入到了伊拉克的“无底洞”中；从经济上而言，美国在伊拉克的“国家重建”花费了大量资金。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不仅在程序上不合法，在结果上其显示的“国家重建”的无能也使其丧失了一切合法性。

第十五讲 多极化深入发展的世界

2024.6.2 / 2024.6.4

一、普京与俄罗斯的重新崛起

冷战结束后的20年，俄罗斯实现了一种“非对称”的复兴，主要体现在经济、军事、外交三方面。

（一）俄罗斯经济的复兴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政府实行了休克疗法，然而这一政策并未取得经济复苏的成果，反而促使了数个寡头的崛起。普京任期开始后，其第一要务就是走出休克疗法的阴影。普京政府依托世界油价的资源出口驱动经济，通过社会福利和分配制度改革改善了民众对政府的观点。此外，俄罗斯重新回到了均衡消费的场域中，聚焦于俄罗斯自身的经济发展，实现了经济结构调整与俄罗斯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克里米亚局势中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制裁反而成为了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深层动力。

（二）军事力量的加强

普京政府与叶利钦政府在军事方面的最大不同即是其政治决心，即“意志复兴”。在这一前提下，普京政府通过催动民族主义，使扩张领土、提高影响力的传统俄罗斯战略回归。俄罗斯试图以低成本方式重建全球军事存在，如在中亚的影响力投射、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在尼日尔的军事存在等。俄罗斯的军事改革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重新开始重视核武器（尤其是战术核武器）的发展；当然，俄罗斯军改在中后期也显现了疲态。

（三）对外政策与俄罗斯对外关系的发展

普京政府提出了“主权民主”的概念，即“民主”必须发生于“主权”之下，不能有“民主”而无“主权”。其次，俄罗斯坚决抵制反导系统的部署以及北约东扩，反对美国全球军事干涉，试图重建力量投射范围的控制权。俄罗斯抵制颜色革命，恢复冷战时期的对美强硬传统，优化中俄关系。

二、欧盟与日本的发展

（一）欧盟的进一步发展

2002年，欧盟邀请了十个国家（主要是东欧和南欧国家国家）进入欧盟，欧盟持续扩大；21世纪初，《申根协议》的适用范围也在扩大，改善了欧盟各国的劳动力和经济问题。

2004年10月，在罗马首脑会议上，欧盟25国签署了《欧盟宪法条约》。这是欧盟的首部宪法，旨在保证欧盟的有效运作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顺利发展。2007年10月的里斯本首脑会议上，欧盟27国领导人经过争论与妥协就新条约的内容取得了一致，并将其命名为《里斯本条约》。2009年12月1日，这一条约正式生效。它是欧盟在一体化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二）日本的政治抱负与右倾化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走上了经济复兴之路，也有了一些经济与政治抱负。政治上体现为右倾化：加快修改宪法，冲击“专守防卫”国策，参拜供奉有战犯的神社，在钓鱼岛、东海划界等问题上挑起海上摩擦，删除敌国条款，推动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

三、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增长和合作团结的加强

（一）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的增长和“金砖国家”

20世纪70~80年代至21世纪，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尤为突出，成为了新兴经济体，如所谓的“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拉丁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等。进入21世纪，在整个世界经济处于低速增长期的同时，发展中世界总体上仍然保持了较好的上升势头；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明显上升，特别是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经济体不仅有高增长，而且对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首次引领了全球经济扶苏。

2001年，高盛证券公司的顾问吉姆·奥尼尔发表了题为《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正式提出了“金砖国家（BRIC）”的概念，指的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这四个对全球经济影响最大的新兴经济体。2010年，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南非也加入了金砖国家的行列，金砖四国也变为了金砖五国（BRICS）。

金砖国家在推动自身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其内部的合作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自2006年起，各国的外长就每年进行会晤。2009年6月，金砖四国首脑在叶卡捷琳堡举行了首次峰会。金砖国家之间的一种多层次、松而不散的合作机制由此形成。

2024年1月1日，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成为金砖国家成员国，金砖国家的力量进一步加强。中国目前保持占有金砖国家内约80%的经济体量，是金砖国家中的重要贡献者。

（二）跨洲性的发展中国家组织的发展

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力量方面获得了重大的发展，相互之间的团结合作也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在此方面的表现之一是，发展中国家原有的跨洲性国际组织，包括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15国集团等，在经过了冷战后最初十年的停滞以后，又重新获得了发展的动力。它们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团结与合作的加强，在推进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地区合作组织的加强和一体化的发展

东盟是发展中国家地区组织中的重要部分。进入21世纪，东盟加强了“大国平衡外交”，成为了连接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大国的桥梁。一方面，与东亚的联系加强，尤其是与中国、日本这样的亚洲经济大国的联系；另一方面，与欧盟、俄罗斯、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也进一步加强。

进入21世纪后，亚洲还出现了另一个亚地区国际组织，即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的前身是上海五国，即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2001年，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从而形成了上合组织。上合组织的重点合作领域是在安全方面。成立当天它即签署的上海公约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作了明确界定，并提出成员国合作打击的具体方向、方式及原则。

南美方面，2007年，南美国家共同体改名为南美洲国家联盟，更加关注南美区域的经济发展，强调经济、金融、社会方面的一体化。非洲方面，早在1963年，非洲统一组织就已建立；2000年，第36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上达成了共识，即成立非洲联盟以取代非统组织；2002年，非洲联盟成立，其目标是建立统一的阿非利加合众国，然而在基础设施、国家政治建设、减少武装战乱等问题上，非盟的目标仍然道阻且长。

四、联合国作用的加强

根据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但是，冷战期间，由于东西方的对立和美苏的冷战，安理会这一作用受到了极大的抑制。冷战结束以后，它才较为有效地履行了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职能。海湾战争尤其典型地体现了安理会的作用。但是，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发动的空袭以及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打击，都是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或批准的情况下进行，对安理会的权威造成的严重的挑战。然而，也正是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国际社会普遍意识到，必须坚持和维护安理会的权威，中俄则是两个积极推动这一点的国家。

进入21世纪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也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冷战时期，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较为有限。冷战结束以后，联合国维和功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主要表现是：一方面，联合国关于维和的概念得到了完善；另一方面，在冷战结束以后，联合国的维和作用得到了显著的增强。

联合国自诞生之日起就面对着改革的问题，而其核心则是机构改革。联合国的改革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是实务改革，即针对联合国机构重叠、效率低下和财政窘追的状况进行改革；第二是政治改革，即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存废问题，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扩大问题。实务改革在冷战结束后加快了步伐，发展相对较快；政治改革则举步维艰，直到21世纪首个十年结束也未有实质成果。

第十六讲 结论：后-后冷战时期的大国战略博弈与国家安全新态势

2024.6.4

一、走向“大争之世”的世界

什么是“大争之世”？周朝末年、秦朝末年，即为经典的“大争之世”。当今的“大争之世”，则是当代国际关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体系力量对比深度调整、全球治理需求持续提升、新旧国际秩序迭代演化。“大争之世”之中，近十几年来国际关系纷繁复杂的演变，已经远超出了十几年前人们的预测。

（一）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与世界经济

世界银行预测，2020~2024年将成为全球经济30年来最疲弱的五年。世界银行于2024年的报告预计，发达经济体增速将从2023年的1.5%放缓至今年的1.2%，而发展中经济体今年预计仅增长3.9%。

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锚和动力源。2023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5.2%，高于世界经济3%左右的预计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美国彭博社预测，中国将是未来5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贡献率将超过七国集团所有国家总和，几乎是美国的两倍。

（二）1600~2023年国际体系的演变

1600年到2023年，国际体系演变的一般进程可被概括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600~1900年。第一波现代化国家推动国际体系重构，西方率先进入现代化阶段并崛起。依托对外扩张和殖民，西方建立了“现代”国际体系，“全球加速进入动荡变革时期”。

第二阶段是1900~1991年。西方国家内部的力量变动推动“现代”国际体系的第一轮交替，全球经济中心从欧洲中心向两侧转移。两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两极格局，西方殖民体系解体。

第三阶段是1991~2009年。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主导西方国家建立并巩固了基于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冷战结束催生“新自由主义”名义下的古典资本主义全面回归，追逐“冷战红利”支撑西方国家引领第一轮经济全球一体化。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影响，挑战西方“赢得冷战”和“终结历史”的乐观认知。

第四阶段是2009年至今。进入21世纪，中国的高速发展推动国际体系深层调整，经济层面的“新两极”格局在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迅速成型，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中国经济持续高速成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模式与实践成为全新的事实。中国成为公元1600年以来首个非西方、非资本主义、非基督教-犹太教文明背景的新挑战者。新自由主义30年高速发展引发内生结构性矛盾持续暴露，国际体系与秩序变迁进入动荡变革期。